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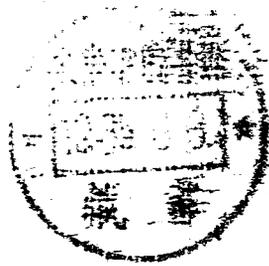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世界和平運動

華超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冊

五卷五

商務印書館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

德體書局

百圖小叢書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目錄

一 最先的記載	一
二 聶斯多略派的教會	九
三 派往蒙庭的專使	二四
四 從聶斯多略派歸化到正宗天主教	三一
五 第一個天主教傳教區	三六
六 閉關時代	四九
七 近代的先驅利瑪竇	五五
八 利瑪竇的收穫	五九
九 進步時代	六六
十 在朝的教士	七〇

十一	內外交迫的艱難	七九
十二	轉機	八五
十三	逐漸擴大	八七
十四	二十世紀的中國天主教	九三
十五	中華本國教會的盛興	一〇五
十六	現下的組織工作和艱難	一一五
十七	結論	一二三
	附中國天主教一九三三大事錄	一三六

參考書目

本書所用參考書籍及其名稱的省文，擇要開列如左：

BCP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eking

張著 張星烜氏中西交通史料匯編

CCS 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 中華公教教育聯合會彙刊

穆勒氏 A. C.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London, 1930

利瑪竇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 J. Edite dal P. Pietro Tacchi Venturi, S. J. Macerata I, 1911, II, 1913

總報 T'oung Pao ou Archiv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langues, la géographie et lehnographie de l'Asie Orientale, Leide, Brill

羅加羅氏 A. Van Den Wyngaert: Sinica Franciscana, I, Quaracchi, 1929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

一 最先的記載

第一個把天主教傳到中國來的人，究竟是不是那十二位宗徒中的一位，聖多默 (St. Thomas) 宗徒呢？這個歷史上的疑問曾引起過許多人研究探討。我們所有傾向於這種傳說的考據，可以開列如下：(一) 耶穌會士金尼各氏 (Trigault, S. J.) 在一六一三至一六一五年間所譯在印度傳教的耶穌會士若翰剛保利氏 (John Maria Campori, S. J.) 的西利亞文作品的譯文 (註一)。(二) 奧斯定會士戈伐氏 (de Gouvea O. S. A.) 一六〇九年前所著的東方史 (Histoire Orientale) (註二)。(三) 多敏我會士茹斯巴克羅自氏 (Gaspar da Cruz O. P.) 在他所著的中國志 (Tractado da China) 中，所有關於這事亞美尼亞人在一五五六至一五六九年間的傳說

(註三) (四) 聖方濟各沙勿略 (St. Francis Xavier) 於一五四六年所有關於這問題的記載，尤其是從印度來的傳說 (註四) (五) 農諾大公哈 (Nuno da Cunha) 在一五三三至一五六三年間，所有關於亞美尼亞人及印度人傳說的覆述 (註五) (六) 十四世紀上半世紀中，兩個聶斯多略 (Nestorian) 派人的記載；一個是埃伯耶穌 (Ebedjesus) 他是一二九〇至一三一八年間的西卑的宗主教 (Metropolitan of Nisibis) (註六) 還有一個許是阿羅斯 (Ammus) (註七) 此外還有兩本西利亞文日課經裏的一篇聖詠。這兩本日課經，一本在馬拉巴 (Malabar) 教會裏，一本在馬拉巴教會外，據說這篇聖詠，是遠在十六世紀末葉以前寫作的 (註八)。

在專憑事實的歷史家看來，這些記載，一點也算不得是有力的證據。所以一班對於上述的疑問，予以否認的歷史家，似乎有充分理由，相信這種傳說是在十四世紀，或是十三世紀末葉（一二八二年）發生的。而且這種傳說，大概在十五世紀中纔流行着，尤其是在印度很盛行。

元代總主教喬伐尼蒙高味諾 (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對於亞美尼亞波斯印度等國，和聖多默宗徒勸化的天主教信衆，以及聶派教會情形，很爲熟悉，可是他並不知道這種傳說。他在

一三〇五年從中國寄信到歐洲說：『宗徒們，或宗徒的子弟們，從不會到過這個地方』。（註九）

耶穌會士白來篤（Melchior Nunez Barreto, O. J.）是十六世紀中，第一個在中國沿海地方登陸，住過幾時的人。他在一五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澳門的記載說：『中國從來沒有聽到過福音，和天主降世的事情』。（註十）

利瑪竇這樣努力搜尋中國古代的天主教信友，竟也完全不知道這宗徒來華說的來歷。如果他知道了，他一定要提起的，像佛教徒利用聖徒的名字，來證實他們的說話一樣，在他述及『達磨』（*Tolome*）（註十一）時提起，或者在他追溯中國『十字教』的來歷時提起。（註十二）這段故事，全是金尼各氏在往羅馬的歸途中，在印度的時候，把利瑪竇的論著譯成了拉丁文後加上的。（註十三）

新近有一位歷史家在他的作品『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國耶穌信友』（*Th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一書中斷定說：『大概人看來，這聖多默宗徒來華的故事，不消說得，是出於晚近的來原。這個故事怎樣發生，也就不難猜測』。（註十四）這就是說這個故事的來

歷，是因人們發現了中國有講西利亞話的信友，纔歸納到多默宗徒既然是其他西利亞人教會的宗徒，必然也是中國教會的宗徒了。這個故事最初模糊的跡象，是在聶派人埃伯耶穌的著作中發現的。他在生長中國的聶派宗主教耶巴拉哈三世 (Yahballaha III) 的指導下，撰寫了這種作品。也許這位作者，以為應當認這聶派宗長所出生的中國教會，和他在那時所統轄的聶派教會，必是出於同一的根源。便是在那西利亞文的日課經中，所有述及中國的地方，也許是在紀元後六四七年、至六五七年間，修正這日課經的時候，或者還在後來，加上去的。(註十五) 那時候聶派的景教，當然已經傳入中國了。(事在紀元後六三五年)

據說在東漢時代，(紀元後五二年、至二二〇年)曾有兩個西利亞教士到過中國。他們到中國來，表面上是爲了要學得養蠶，治絲的方法，把蠶子帶回歐洲起見，可是他們的本意，乃是傳教。(註十六)

在西方典籍中，所有關於福音傳佈到中國最先的記載，是在 *Adversus Gentes II, 12* 一書中找到的。這部書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文學家阿諾比五 (Arnobius) 在三〇三年至三〇五年間的

作品。他爲排斥異教擁護天主教起見，在許多論證以外，還提出基利斯督的宗教傳播迅速一層，作爲真教的憑證。他發揮這段議論時，明白述及「賽來司」(Seas) (意謂蠶國，即中國)爲許多福音已經傳到的國家中的一國。(註十七)考「賽來司」這三字，是從希臘文「賽爾」(Ser)得來，「賽爾」的解釋，是蠶。因爲絲蠶從中國，亦稱「賽利加」(Serica)傳到了歐洲，歐洲人纔知道有中國，所以那時候的希臘羅馬人，就給中國起了這個名稱。(註十八)然而一位文學家，在發揮一種宣言式的議論時，信筆拈來的話，也許在一般讀者的心目中看來，對於這中國古代天主教的疑問，不見得有甚麼重大的歷史價值吧。

依據設立中國主教區的事實，我們對於這個疑問，也許更可以得到一種印證，雖則這些事實確實的來歷無從追溯，可是在八五二年，至八五八年間，早就有人述及了。有幾個作家說那時中國主教區是七一四年祝聖的聶派主教撒利巴薩加 (Saliba-Zacha)所設立的。也有人以爲是宗主教西拉 (Silas) 或者竟是宗主教阿該烏斯 (Achaenus) 所設立的。考西拉氏祝聖主教，是在五〇三年，阿氏在四一一年。(註十九)假使後一說是信而有徵，那麼中國主教區的創設，似乎不是由於聶斯

多路派，却由於天主教正宗了。因為聶斯多路在四二八年以前，還沒有做着君士坦丁城（Constantinople）的主教，到四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纔被厄弗所（Ephesus）公會議擯斥，認為異端的。但是我們即使承認那聶派主教埃伯耶蘇遲到一二九〇年，至一三一八年間，纔寫着上述的記載，是有歷史性的，我們也找不到甚麼證據，可以證明那幾位中國的教長的確住在這劃分給他們傳教的中國境內。他們也許在中國境外，住了好幾百年（註二十）。

（註一）金尼各氏：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一六一五年，一二四至一二六頁。

（註二）戈伐氏（De Gouvea）東方史（Histoire Orientale），格倫氏法文譯本（T. F. de J. B. de Glen.）查凡爾（Anevrs）一六〇九年，三四頁，六至九頁。

（註三）赫斯巴克羅自氏：Tractado da China, Evora, 一五六九年，第十三張（folio XIII）

（註四）耶穌會史記沙勿略筆記（Monumenta Xaveriana）一冊，四〇七及四一四頁。

（註五）巴勞氏（Joao de Barros）亞細亞記（Da Asia）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三日，一集，卷七十一章，三〇五頁。

（註六）Scriptorum Veterum Nova Collectio e Vaticanis Codicibus edita，羅馬一八三八年，十集，Collectio

Canonum 卷九第一章一五四頁。

(註七) 阿才斯陸尼 (Assesmani) 氏東方誌 (Bibliotheca Orientalis) 卷三十一冊五頁。按該氏所引羅斯氏所著各宗法教傳內，我們找不到關於這一點的記載，故此在疑位間。

(註八) 模勒氏 (Moule) 十一頁註十四。

(註九) 溫加爾氏 (Van Den Wingaert) 三四七頁。

(註十) Cartascrita de Macao em 23 de Novembro de 1555, nos Irmasós da India, Portugal, e Roma. 雜錄
出書歐文譯本頁 Diversi Avvisi particolari dall' India di Portogallo ricevuti dall'anno 1551 fino al 1558
dall' Reverenti Padri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Venezia 1558) fol. 271, ro

(註十一) 列瑪實 一冊九三頁。

(註十二) 同上，一冊八七、八八頁，二冊三三八、三五七頁。

(註十三) 金尼各氏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一一四頁。

(註十四) 模勒氏 二四頁。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

八

(註十五) B O P 主張聖多默會來華傳教，見一九二五年，六四—一〇〇、一四一—一八〇、二一九、二五六頁；一九二六年，三〇—四頁。

(註十六) 岑文彬氏 (Ci Ung Bing) 中國史略，上海出版，(一九一四年)，一五七—一五八頁。

(註十七) Arnobii Disputationum adversus Gentes Libri Octo, Roma, 1542, fol. XVII v°。又模勒氏 111111 頁。

(註十八) 參閱上海出版之三月刊亞東雜誌，一九〇四年，第三冊，一八三—至一八八頁。愛特金氏支那名稱源流考 (Origin of the name China, by Joseph Edkins; 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 見後二章註四。

(註十九) 模勒氏 110—至 111 頁。

(註二十) 同上 116 頁。

二 聶斯多略派的教會

一六二五年，大概在三月開始時候，陝西西安西郊土中，掘出了一個大石碑。(註一) 這個石碑，似乎是在八四五年九月三十日，(唐武宗會昌五年) 頒發了滅教詔諭後，埋在地下。石碑上面刻着華文和西利亞文字，日期是七八一年，二月四日。(唐德宗建中二年) 這是聶派會外神職班的薩巴才 (Sardbozed) 在七八〇年，至七八一年間的冬季集會時，(註二) 建立的。他是土加來斯 (Tokharistan) 的巴爾格 (Balh) 城人。(註三) 不消說得，這個石碑的來歷，是出於聶派的教會。碑上先給我們天主教中重要教理的綱要，講着天主三位一體，創造世界，原人的義德，原祖的墮落，以及天主第二位的降孕，誕生，和救世主的救贖，升天，等事。其次，敘述自六三五年至第九世紀的上半世紀中，所有聶派在中國傳教的經過情形。略稱阿羅本 (Alopen) 是於六三五年從大秦來到中國 (這大秦 (註四) 大概是指波斯) 來後三年，即六三八年，太宗給他建立寺院一所於西安，

此後各寺院，是由繼續太宗做皇帝的高宗建立的。（六五〇至六八三年）同時，阿羅本受封爲護國大法主，聶派的宗教——景教——便傳遍了十道，各處城市都有景教寺院，其後，佛教僧徒，曾兩次起來和他們爲難，一次是在六九九年，一次在七一三年。但在七四二三年間，玄宗（七四二至七五五年）卽位後，復邀寵遇。代宗（七六三至七七九年）和德宗（七八〇至八〇四年）也都優待他們，碑文的結束，是一篇頌辭，歌頌唐代「列聖」的恩德。列名碑末的人很多，都是聶派的主教，司鐸，和修士們；他們的銜名是用西利亞文字鑄石的。（註五）

聶派傳教士到了中國不久，便着手譯經典。二十世紀開始時，清代光緒庚子年間，在甘肅燉煌石室發現這些譯經的幾種，大概是在六三五至七〇〇年間，在西安附近譯成的。

在許多關於教義的華文作品中，最古的，似乎要算『移鼠迷詩河經』（一名序聽迷詩所經）（*Book of Jesus Messiah*）了。這部書大約是六三五至六三八年間的作品，晚近纔發現，譯成西文。（註六）在這部書裏，天主稱爲「天尊」；有使我們想起十誠的言論，也講到原罪，貞女產子，天主降孕等事；敘述救世主一生的行實，還算詳盡，講他誕生時的異星，又講若翰保第斯大，給他付洗，天主

聖神借着白鴿的形像降臨，還述及耶穌的聖蹟和他的受難；在比辣多衙門受審判時，比辣多曾宣告道：『我找不出甚麼緣由，好殺死這個人』；又講他在過了三十二歲的時候，爲了要救贖『衆人』，死在木架上，（註七）在兩個強盜的中間。

同時發現的，又有一部手抄本。這是大約在六四二年前上寫作的一個小本子叫『一神論』。這部書裏講及娑殫、原祖亞當、肉身的復活、天神和地獄的永遠等事（註八）。

還有一部抄本；名叫三威豪度讚。這是一篇對於天主聖三的頌讚，和東西利亞式的『榮福經』一般無二。這是一篇經文，天主教的司鐸們在舉祭時候，差不多天天要念着的，便是現在，也還念着（註九）。最後一部手抄本，（註十）開首就寫着天主聖三三位的聖名，其次是幾位天主教聖人們的名字，末了，是幾部已經譯出的教中書籍的名稱。天主聖三三位的名稱，是以阿羅訶爲天主聖父，彌施訶（即默西亞）（註十一）爲天主聖子，盧訶寧俱沙（西利亞文：“Ruha da gusha”）爲天主聖神。在許多聖人們的名字中，容易認出的，是梅瑟、達味、瑪竇、瑪爾谷、路加、若望、保祿等（註十二）。聶派教士來華時，帶來的經典，一共有五百三十部。據說那時已經譯成華文的有三十五部，如『達味聖

經』——這也許是歌詠——『梅瑟經』及『聖保祿信』、『福音經』、『日課經』及『禮儀篇』，諒必也在其內。在這些古代宗教經典中，至今發現的只有兩部，就是宣天至本經和志玄安樂經。這兩部書大約是第八世紀末葉，大秦寺僧景淨所譯，便是那西安的景教碑，也是他撰作的。

據說，現在還保存着當時景教寺僧華文的聖經（註十三）。這種手蹟，是否真確，姑且不論，可是除了燉煌石室所發現的以外，還有一部紀元後七五一至七五二年，西利亞文的手抄本，到一七二七年還保存着。這部抄本的主人，是一個中國的回教官員，書中包含着聖歐弗萊（St. Ephrem）尼西卑的雅各伯（James of Nisibis）和其他信奉耶穌的作家所撰作的詩咏、頌讚（註十四）。

在將近紀元後七百年的時候，像四川成都那麼遠的地方，也建立了一座景教寺院（註十五）。西安的景教碑也明明說起古大（Khandan）和薩拉格（Sarag）二城的主教，這兩個地名，大約就是陝西的西安和河南的洛陽了（註十六）。

在八四五年上（唐會昌五年），武宗受了道士趙歸真等的欺騙，發了一道嚴厲的滅佛詔諭，敕令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餘所，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

收腴田數千萬頃（註十七）。那時候，景教僧、及回教、祆教僧侶，共有三千餘人。所以詔諭中還有「勒大秦穆護被三千餘人還俗」的話，說：「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註十八）送還本處收管」等語（註十九）。

因着這次的教難，聶派教會的損失，究竟有多少數目，我們可不知道了。可是我們確實知道他們經過了這次風波以後，却依舊沒有絕迹。事實上，武宗到了下一年就死了，宣宗（八四七至八五九年）繼位，便收回了先帝滅教的成命，重建寺院。想來景教僧徒，也必乘此時機，力圖恢復。從這些事實上看來，我們可以約略知道，據說在八七八年，黃巢作亂時，十二萬的回回、猶太、波斯人和信奉景教的人們，在廣府（註二十）殲滅的來歷了。（註二十一）可是到了九八〇年，一個聶派主教會派人回歐報告，說道：「中國的景教，如今纔毀滅了。奉教的本國人」（註二十二）先後消滅；他們的教堂，都已拆毀了；中國境內，只剩了一個景教信友」（註二十三）。這樣看來，中國景教，第一次完全毀滅，諒必是在將近紀元後一千年的時候（註二十四）。

然而在十二世紀，至十三世紀中，蒙古人入主華夏，景教僧徒，却依舊捲土重來。他們漸漸變得

很有勢力，在元成宗時代（一二二九至一二四〇年）也許更在元世祖（一二〇六至一二二七年）和其他的元代皇帝御宇時代，竟可以不納租賦，不完捐稅。而且這幾個皇帝，還許他們免除其他任何義務，只要他們爲皇帝祈禱（註二十五）。

我們看了這種情形，對於馬可孛羅（Marco Polo）一二七五至一二七九二年間，在中國各處，像蒙古、甘肅、山西、雲南、河北的河間、福建的福州、浙江的杭州、江蘇的常熟、揚州（註二十六）鎮江等處，（註二十七）發見許多重要的景教教堂這回事，便可以得到一個解釋了。講到鎮江一處，中國史籍上的記載，很足以證明馬氏遊記中的話爲不虛。那時候，信奉景教的馬薛里吉思（Mar Sargis）正做着鎮江府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在一二七九至一二八一年間，（至元十六年至十九年）先後於城內外興建景教寺院六所，此外又在杭州建寺一所（註二十八）。景教信徒還在鎮江附近建大法興寺。（註二十九）到一二三三三年上，鎮江馬氏所建的六寺，還有四寺存在，其餘二寺，於一三〇九至一三二一年間，改作了佛寺（註三十）。據晚近發現的一本書上所說，馬可孛羅在福州相近的地方，還遇見過天主教（？）信友，他們的祖先，是遠在第六世紀中到中國來住下的（註三十一）。

無論如何，利瑪竇在一六〇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曾記着說：他『不多幾天前，』纔確實知道中國在最近五百年間，有天主教信友，而且在許多地方很多着有過天主教人的證據。（註三十二）

至於景教方面的遺跡，數百年來陸續發掘出土的也很不少（註三十三）。如十三四世紀中，在信奉天主教的古國盎葛（Orange）所找得的各種遺物，上面都有十字形（註三十四），又如在福建泉州及附近地方，掘得了五塊有十字的石碑（註三五）。泉州舊名刺桐（Zaitun）是中古時代福建的一個大城市（註三十六）。又在蒙古石柱子梁找得了好幾個有十字的墓石，許是十二世紀至十三世紀的遺物（註三十七）。一九一九年，在北平西南四十里地方的十字寺裏，又發現了兩塊刻花的石碑，碑上有文字：一塊是九六〇年立的，一塊是一三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日立的。碑頭上都有十字，和泉州出土的石碑相似。這種形式，想必是唐代遺傳下來的（註三十八）。再則中國古籍上往往載着景教信徒的名字（註三十九），和從景教來的異教教派名稱（註四十）。又新疆和蒙古的中部，和東部，有幾處義塚裏有十字形的墓碑上面，刻着的年月，約略是在一二〇〇年至一三六〇年間的時代（註四十一）。

（註一）參閱伯希和氏（Paul Pelliot）中亞及遠東之景教信徒（Chrétiens d'Asie Centrale et d'Extreme Orient）

見通報一九一四年，六二五頁。

(註二)同上見通報一九三一年，二一九頁。

(註三)通報一九一四年，六二五、六二六頁。

(註四)據夏德博士(Dr. Hirth)的意見，以為這個「秦」字用來稱希臘羅馬時代的著作家，所認為賽爾(Sai)或是賽來司

(Sera)的東方人。同時也用來稱在西方的第爾(Tyr)城，希伯來文為足爾(Tsur)或蘇爾(Snr)。(參閱 *Syrisch-*

Chinesische Beziehungen 四四二頁第三節)無論如何，在公元第二世紀時代，中國稱做「秦」，西利亞和東羅馬稱做

「大秦」，因為西利亞和東羅馬人比中國人長大。後漢書上也提及大秦，或是西利亞人說：「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

國，故謂之大秦。」(卷八，二三四頁，後頁)參閱通報一九〇七年，一八一頁，又一九〇五年，五五六頁。張星煥氏：第一冊，四

十頁。夏德氏：中國與東羅馬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六七至七七頁) 博物志異人門，把大秦國比中秦國人，

說得更奇特，卻又是一致的。(參閱張氏第一冊，二十頁)關於支那名稱的來歷，參閱通報一九一二年，七一九至七四

二頁，又一九一三年，四二七、四二八頁。

(註五)夏鳴雷氏 Hayret: La Stele Chretienne De Singan-fou, 上海，一八九七年。

(註六)原文和英譯文，見 OOS 一九三二年，一一一三至一一三六頁。參閱模勒氏，五八頁。

(註七)在第八世紀的末葉，(七八一年)已知用「木」字來表聖架，像西安的景教碑一樣。所以這裏用「木」字應當特別注意。因為用這個「木」字，和宗徒大事錄，五章，三〇節，十章，三九節，十三章，二九節，又伯多祿第一書信，二章，二四節；保祿書信，加拉達，三章，一三節，所說的完全切合。據中國文書上所載，元代景教寺院都稱「十字寺」。一二八一年，鎮江十字寺的石碑上，明明說也里可溫習慣着把十字豎在他們的屋上；寺院裏都畫着十字；他們的頭上帶着十字，胸上也掛着十字。(參閱模勒氏「中國聶斯多略派十字的用途」(The Use of the Cross Among the Nestorians in China)見通報，一九三二年，七八至八一頁。)

(註八)有本書華文抄本。(參閱模勒氏，五八頁)參照此書英文譯本，見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3, pp. 87-105.

(註九)原文見張著第一冊，一九五，一九六頁。英譯文見模勒氏五三至五五頁。

(註十)原文見張著第一冊，一九六，一九七頁。參閱模勒氏五八頁。

(註十一)默西亞一稱「彌戶訶」七九四或七九五年釋籍「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中，也有這個名稱。(參閱通報，一八九六

年，五九〇頁，一九〇四年，三八二頁，又模勒氏六九頁。

(註十二)元史中，還有其他景教信徒華名(卷一二四、五頁)如「玉笏迷失」即若望彌額爾，(John-Michael)。「力蓮迷失」即良彌額爾，(Leo Michael)等。參閱張著第五冊，四七四頁，其他信徒所用聖名，見通報一九一四年，六三〇、六三八頁。

(註十三)據說曾作北京寓公多年的李君，藏有景教聖經一本。可是許多學者們總有些懷疑着，不敢決定他的真贗。(輔仁大學學誌，一九二九年，第六期，八一頁。)

(註十四) 模勒氏八六頁。

(註十五) 證見杜工部詩集，卷七，八頁，又杜詩精鈔，卷七，一四頁。(參閱模勒氏七一、至七二頁。)

(註十六) 參閱通報，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九一、至九二頁。

(註十七) 舊唐書卷十八上，一七頁。參閱輔仁大學雜誌一九二九年，第六期，一一九至一二四頁。

(註十八) 模勒氏論及景教信徒們的組織，及國籍問題，曾說道：「在初期內(六三五至八四五年)我們所知道的，全是證明景教在組織上都是屬於修院性質的，而且除了唐書裏有一句意義不確定的說話外，也沒有景教信徒不是外國人的

明白證據是「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一九三一年, 四五六頁」中國古代景教的失敗」(The Primitive Failur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然而從八四五年的詔諭上所有的字句看來, 似乎當時非外國人的景教信徒確是有的。(同上四五七頁) 又唐代遺下來的還有五六件教中文書, 可以表明在那些古代景教寺院中, 也有強有力的中國份子。(同上四五九頁)

(註十九) 舊唐書, 卷十八上, 十七頁下。(參閱張著第一冊, 二〇二至二〇三頁)

(註二十) 這件事實是由一個阿拉伯作家阿布開特 Abu-Zayd傳述的。參閱萊諾氏 Reinand: *Relations des Voyages*,

巴黎 一八四五年, 冊一, 六四頁。又費耶氏 G. Ferrand: *Voyage du marchand arabe Sulaymân en Inde et*

en Chine redigé en 851 suivi de remarques par Abû Zayd Haran (916) 巴黎 一九二二年。但是著作家對

於「廣府」的意見不一。有的以為是廣州府的舊名, 有的說指中古時代的杭州、激浦。關於後說的主張, 可參閱 *Le Petit*

Messageur de Ningpo, 一九一五年六月至一九一六年五月間的諸編。張星燾氏的意見和後說相反。(張著, 第三冊, 一

二四至二二八頁, 一七八至一七九頁, 又一三二頁。註二) 伯希和氏亦主張前說, 見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一九〇四年, 二一五頁。又通報 一九二二年, 四〇二四一〇頁。事實上, 廣府這名稱, 中國典籍中, 在

紀元後七九四、八〇〇年上，早就有過了。（參閱樸勒氏六八至六九頁，又註八二）

（註二十一）張氏第三冊，一三一、一三二頁。又唐書僖宗本紀和黃巢傳。

（註二十二）注意這裏稱奉教的「本國人」。

（註二十三）樸勒氏：Moule: *The Primitive Failur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見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一九三一年，四五七頁。參閱 H. Jule: *Cathay*, 一冊，一一三頁。

（註二十四）關於中國中古時代景教信友的華文書本，可於陳垣氏所著的也里可溫一書中概見。也里可溫「四字」的意義就是景教信徒，也許是景教中的司鐸。（見通報一九三二年，一五一頁。）也有人以為這個名稱是從「阿羅訶」（"Alouha"）一語的變音得來。在西安的景教碑中，「阿羅訶」這個名稱，是用來表示天主的。那麼，也里可溫「的意義，必然是「阿羅訶教的信奉者」了。這個和現在通行的名稱「天主教」是一般的。（參閱張氏，第二冊，九二至九三頁。）

（註二十五）參閱通報，一九〇八年，三七六至三七八頁；又三八八、三九〇、三九七、四〇二、四〇七、四〇九、四一三、四一七頁。

（註二十六）至近年只有真福和德理（Bd. Odrorio da Pordenone）提起過在揚州的三座景教寺院和一座方濟各會修院。（參閱溫加爾氏，四六九頁，第一節）但伯希和教授近又找到一三一七年的一件詔諭，和這三座景教寺院中的

一座，是有關的。這座寺院，是一個富商叫亞伯拉罕的，在十三世紀中造的。（參閱通報一九一四年，六三八頁。）

（註二十七）參閱模勒氏，一三一至一四三頁。又通報一九一五年，六二七、至六八六頁。

（註二十八）模勒氏：一四九頁。

（註二十九）模勒氏：一五一、至一五二頁。

（註三十）原文見張著，第二冊，二七九、至二八八頁。英譯文見模勒氏，一四五頁。（參閱通報一九一四年，六三七頁。）

（註三十一）倍內戴篤（Benedetto）氏·馬可李羅簿 Marco Polo II Milione，一五八頁，註戊。又 POP，一九二八年，

五七五至五七八頁。又 The Book 一九二九年，五〇至五一頁。

（註三十二）利瑪竇，二冊，二八九頁。又參照同上，一冊，四六九、三四四、三五七頁；二冊，二九一、二九二頁。

（註三十三）參閱 POP，一九二六年，三八七、至三八九頁。

（註三十四）參閱 POP，一九三三年，一八七至一九一頁。又 The Chinese Recorder，一九三〇年，一〇四至一〇八頁；

二五一至二五二頁；三五一至三五二頁；三九〇、至三九一頁；七〇四、至七〇六頁。又同上，一九三一年，二三七、至二四二

頁。又通報一九三一年，八四頁。

(註三十五)泉州五塊十字，都是十一世紀以下的遺物。(參閱 Fr. Gregory Arnaiz 的 *Relation sur les croix anciennes trouvées dans la ville de Taintentheou* 見 *ROP* 一九二七年，六五至七一頁。又*通報*一九三一年，八三至八四頁。)

(註三十六)泉州古稱刺桐，見*通報*一九一一年，六七八至六九一頁，七一三至七一六頁。

(註三十七)參閱*通報*，一九三一年，八三頁。又 *ROP* 一九二四年，五四至五五頁。

(註三十八)參閱 *ROP* 一九二二年，二九〇至二九七頁；三二六至三二九頁；三七五至三八〇頁；四二〇至四二八頁；四六四至四六六頁，又一九二三年，二一八至二二四頁；二八二至二八五頁。又一九二四年，五二至五四頁；八二至八三頁。又一九三一年，五四三至五四七頁。又一九三二年，三見四七二至四七四頁。這兩個有十字石碑，現在由北平歷史博物館保存着。(參閱 *ROP* 一九三一年，八八三頁。)

(註三十九)元史中有趙世延傳，(卷一八〇) 馬祖常傳，(卷一三四和一四三)又愛薛即 *Tsa, Jesus*，(一一二七至一一三〇八年)參閱 *Journal Asiatique*，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四〇九頁，註二。又*通報*，一九一四年，六三八至六四〇頁；一九二七至二八年，一六二至一六八頁。其中有一望而知是景教信友的名字，如徹里即嘉祿 (*Charles*) 伊噶即備

略(Julius),

(註四十)異教教派名稱如未來教。(見 BOP 一九二七年, 二一至二四頁)黃吉道(即 Evangelism)見同上, 二四五至二五三頁)燒香教(見同上, 三二三至三二四頁)金丹教(見同上, 一九三二年, 三八至四三頁)等派講着天主聖三、降生、救贖、救靈、告解等基本要理。

(註四十一)模勒氏, 七五至七六頁。BOP 一九二四年, 五四至五六頁。又 *Indices* 一九一〇年, 一二四冊九頁, 註三。又 *Journal Asiatique* 一九一四年, 四至五月, 四九七、四九八頁。通報一九一四年, 六二七、六四三頁。

三 派往蒙庭的專使

蒙古人還沒有入主中國以前，他們的勢力已伸張到歐洲，侵入俄羅斯和波蘭兩國。所以在十三世紀中葉，歐洲人很受蒙古民族的威脅。在一二四五年的里昂(Lyons)公會議中，教宗依諾增德四世(Innocent IV)說明如不設法使蒙古人退回，西方的天主教教化就要感受着極大的迫脅。他於是決計派一個教廷專使，到東方去和蒙古人講和，他擇定擔任這件重要任務的人物是一個方濟各會修士，名叫喬伐尼比亞諾賈比內(Giovanni da Piano di Carpino)(一一八二至一二五二年)這位修士生長在意國貝路日亞(P Perugia)附近，是聖五傷方濟各的弟子和同伴。那時候，他已有六十多歲了。他於一二四五年四月十六日，由里昂出發，經過薄黑米亞(Bohemia)、薛來西亞(Silesia)、波蘭、俄羅斯，沿着裏海的北境，一路前進，長途跋涉，歷盡艱辛，走了一年多，再渡過了阿拉爾海(Aral Sea)和巴爾加許湖(Lake Balkash)，取道秦茄里亞(Zungaria)，越過阿爾泰山

脈。(註一) 纔於一二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到了蒙古的都城喀拉固倫。(Karakorum) 那時候，正值新君貴由汗 (Kuyuk) (卽定宗) 嗣立。賈比內便覲見新君，呈遞了教宗文書。又參加了同年八月二十四日，新君登極大典。當時有兩個大臣，一個叫喀篋 (Tadag) 一個叫商台 (Chingar) 也是信奉景教的。賈氏得到了定宗回書。(註二) 便於同年十一月十三日，陛辭，起程回歐，路上又吃盡了一番苦，於一二四七年秋間，到了法國，過了五年(卽在一二五二年) 這位教廷專使，在盎底伐里 (Anivari) 總主教任上去世了。(註三)。

這位教宗欽使，回到歐洲的時候，第七次的十字軍，正將出發。法國的聖王類思九世，統率了十字軍，一路向聖地前進，一二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這位聖王到了西潑魯斯 (Cypus) 就遇到蒙古長官阿爾及吉台 (Aljisdai) 打發來的兩個景教信友，達味和瑪爾谷，報告定宗和他的母親，已奉了天主教。聖王於是決意派遣專使去見阿爾及吉台和定宗，揀了一個多敏我會的法國人，叫安德肋龍汝模 (Andre de Longjumeau) 的充任欽使。他是法國高倍依 (Corheil) 附近，龍汝模村人。法王又派了兩個多敏我會的法國人和他同行，一個叫若望葛格松 (Jean de Carcassonne) 是上巴

尼 (Champagne) 人，一個叫奇耀謀 (Guillaume) 或名奇篤 (Guido) 龍汝模，大約是安德肋的兄弟。法王備了禮物和國書交這位欽使帶給阿爾及吉台和定宗，另外還送給他們十字聖架的聖木。同時，東方教廷欽使與東沙多魯 (Card. Odon de Chateauroux) 樞機，上書可汗，又分函聶派各主教，勸他們隸屬教宗權下。龍欽使和他的隨員，於一二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離了西潑魯斯，一年後到了大約在愛密爾 (Emir) 谷內的蒙古朝廷。那時候，定宗已在一二四八年，三四月間逝世了。龍氏於是覲見了定宗皇后兀立海迷失 (Ogüi-Quimis)。她接受了聖王類思的禮物，當作外國臣服的貢賦，又寫了一封回書，用高傲的口吻，命法王年年朝貢。這封信是由皇后派遣和龍如模等同行的蒙古欽差，於一二五一年，帶到巴來斯定的薩里亞 (Caserta) 地方交給聖王的。聖王想起了和那傲慢的君主，通使來往，却也有些後悔咧 (註四)。

雖然如此，不多幾年以後，傳聞成吉思汗的曾孫，他的封地是在唐 (Don) 和伏爾加 (Volga) 間的薩答克的 (Sarac) 信奉了天主教。這位聖德不凡的類思王，便耐不住發了一封書信，去祝賀他。恰好那時候有兩個方濟各會的修士，正要起程到東方去，聖王便利用了這個機會，叫他們把這

封信帶去。這兩個修士，一個叫奇耀謀魯勃路克（Guillaume de Rubruc）是在將近一二二〇年，生長在法比二國間的加賽（Cassel）相近，魯勃路克的弗來明（Fleming）族人；一個叫巴爾多祿茂克來蒙那（Bartolomeo da Cremona）是意國人。他們都抱着滿腔熱血，專心一志，要去勸化那異教人棄邪歸正。他們雖然只是平常的傳教士，並不做着法王的欽使（註五）但是聖王却信託他們，叫他們把信帶給薩答克。這封信裏，不但根據着謠傳，祝賀他奉了天主教，還請他允許這兩位傳教士，在他的國境內住下傳教。這兩個教士，於一二五三年，四月十六日，從君士坦丁城出發，經過了三個半月艱難險阻的行程，於同年八月二日，到達了在伏爾加相近，薩答克的營帳。他們在覲見薩答克的時候，奇耀謀穿着他那最寶貴的祭衣，手拿着一本美麗的聖經，和聖詠本；巴爾多祿茂拿着一本祭經，和一個十字架，兩個人都唱着經。薩答克把他們送到在伏爾加的他的父親巴多（Batu）那裏。巴多又把他們送到一處喀拉固倫（Karakorum）相近的地方，大可汗蒙哥（Mongka）即憲宗那裏。這兩位教士，因為天氣寒冷，食物不適口味，苦得很厲害。他們於一二五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了大可汗營帳。蒙哥的母親少加克答尼（Bargagani）是一個熱心的景教信友，他的首相包爾

蓋 (Balgai) 也已信奉了景教。於是這兩位教士，便於一二五四年，一月三日，覲見了蒙古皇帝。憲宗許他們在境內居住兩個月。他們於四月五日，從大可汗那裏，回到喀拉固倫，遇到了三個歐洲人，一個是法國銀匠奇耀謀步希 (Guillaume Boucher)，他是巴黎人，在貝爾格拉 (Belgrade) 陷落時候，被擄來的；一個是他的妻子，法國老萊 (Lorraine) 人；還有一個是英國人，叫巴西略 (Pasil) 教士們在大可汗前，曾參加過一番有名的大辯論，辯論各種宗教 (註六)。結果，有五人領洗入天主教，還勸化了一個聶派的司鐸 (註七)。他們於一二五四年，八月十八日，帶着蒙帝給法王的回信，啓程回歐。可是巴爾多祿茂體質衰弱已極，竟不能繼續他的行程，只好在中途留下。奇耀謀却於一二五五年，獨自回到了西潑魯斯，做了一個報告，呈覆法王 (註八)。當時人們以為加帶盎人 (Cathayans) 就是古希臘羅馬時代的賽來司人。首創這說的，便是這位魯勃路克教士。後來利瑪竇在一五九五年上，就證明這一層是確實的；到了一五九八年，又重新加以證實。一六〇八年 (註九)，耶穌會修士鄂本篤 (Benedict de Goez) (註十) 從印度到中國甘肅 (註十一) 作內地旅行以後，又找到了更有力的證據。

(註一)參閱 The Rock 一九三二年，二四五至二四九頁，「教士若望比亞諾賈比內旅行記 (The Journey of Friar John de Piano Carpina) 及附圖。」

(註二)原書係於一九二一年，在華諦岡圖書館發見。參閱希伯和氏「十三四世紀中蒙古人和教宗」(Mongols et Papes aux XIIIe et XIVe Siècles) 九至十頁。又伯氏「蒙古人和教廷」(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 一五至一六頁，一八至二三頁。法譯文見溫加爾氏，一四一頁。

(註三)參閱真福和德理六百週年紀念刊，(VI Centenario del B. Odorico da Pordenone) 一册，一七七至一七八頁。又溫加爾氏，三至一三〇頁。

(註四)新近伯希和氏對於安德肋龍如模奉使來華一事，作深切的研究，曾發表過一篇論文「蒙人與宗座」三章，安德肋龍如模 (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 III, André de Longjumeau) 見 *Revue de l'Orient Chretien* 三編，卷八 (XXXVIII) 一號及二號，(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 三至八四頁。

(註五) 溫加爾氏 一五三至一五八頁。

(註六) 同上，二九四至二九七頁。

(註七)同上,三一二頁,二八三至二八五頁。

(註八)同上,一四七至三三二頁。

(註九)一五九五年,見利瑪竇二冊,三四六至三四七頁;二二七,至二二八頁;三五六頁。一五九八年,同上,一冊,二九六頁;二冊,三四七頁。又一六〇八年,同上,二冊,三四六至三四七頁;三五六頁;三七五至三七六頁。參閱開上一冊,五二八頁註一。

(註十)參閱 The Man Who Identified Cathay 見 The Rock 一九三二年,一五九至一六二頁。

(註十一)閱高田氏 H. Cordier: Le Christianisme en Chine et en Asie Centrale Sous les Mongols 見通報 一九一七年,四九頁。

四 從聶斯多略派歸化到正宗天主教

我們在十三世紀的下半世紀中，見到了一件神奇的故事。這件故事，便是兩個生長中國的聶派修士，後來做着該派高級教長；到了老年，似乎幡然感悟，歸奉了天主教。這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拉本掃馬 (Rabban Sauma) 一個是耶巴拉哈三世 (Mar Yahballaha III)

掃馬是在將近一二二五年時候，在蒙古人叫剛巴里克 (Khanbalig) 的北平地方誕生的。他的父親叫西朋 (Siban) 是個聶派信徒，擔任着視察員的職務。他從小就出了家，隱居在和他生長地方相近的山中（註一）。過了幾時，他得了一個同志，和他一起隱居。這人叫瑪爾谷（一二四五至一二一七年）是綏遠，東勝（註二）地方，一個聶派神長班尼愛 (Baniel) 的兒子。他是來拜掃馬做老師，請教怎樣絕慾隱修的（註三）。在一二七五至七六兩年間，他們師徒倆，向西進發，想去朝拜聖地。那時候，元世祖忽必烈已經命馬可孛羅的父親和叔父，回來時候，取些耶穌聖墓前的燈油，帶回

中國，此番他知道這兩個修士要去朝拜聖地，又教他們把幾件衣服帶去，在聖墓上摩擦一下。可知那時候，世祖左右的親王貴主，信奉景教的不知有多少咧。在一二八〇年上，這兩位修士到日露撒冷的途中，將到巴格大 (Bagdad) 時候，聶派的宗長，便派拉本 掃馬 做了總視察——那時候他只有三十五歲——又派瑪爾谷 做了中國主教。後來瑪爾谷 在一二八一年十一月二日，竟被選任了聶派的宗主教，取名耶巴拉哈三世 (註四)。

不多幾年後，蒙古王阿爾根 (Arghun) 爲了要在巴來斯 定取一致行動，就該得到歐洲 列強的協助起見，便選定掃馬 擔任這番折衝樽俎的任務。掃馬 一行人於一二八七年三月間，在黑海 的一個口岸乘船到了君士坦丁城，再從那裏經過兩個月的海程，到了奈泊爾 (Naples) 又從奈泊爾 到了羅馬。他們到羅馬 的時候，教宗奧諾利伍四世 (Honorius IV) 正已逝世。(一二八七年，四月三日) 掃馬 到羅馬，是爲「要向他主子，教宗，表示敬意」，呈遞阿爾根 和耶巴拉哈 的書信，所以他在新教宗 未曾登極之前，便乘機到了法國。他於同年九月間，到了巴黎，覲見了法王 斐理伯勒貝 (Philip le Bel) 得目睹耶穌 的茨冠 和十字架 的真聖木。十一月間，他從巴黎 到了包陀 (Bordeaux)。

那裏英王愛德華一世(Edward I)正在行宮裏住着據說他在行宮裏行過聖祭英王在他手裏領過聖體(註五)。

一二八八年二月間，新教宗尼古拉四世登極後，拉本掃馬便趕緊到了羅馬。他和他手下一班人去覲見新教宗，很受教廷歡迎。他見過了教宗，便把阿爾根王和耶巴拉哈三世的書信，當面呈遞，奉上這位「聖主子和共父教宗」(註六)。他請求許他當着教宗面，舉行聖祭，竟也得到了許可。羅馬教友還加上了一句按語，說：「語言雖然不同，禮儀却是一樣」(註七)。不但如此，掃馬還求赦宥他的罪過，要在教宗手裏領聖體，作爲他完全歸化羅馬教會的標記。事實上，在聖枝主日，那一天，教宗舉行彌撒聖祭，「在掃馬行過告解之後，便給他送了第一個聖體。」就是說，掃馬在領聖體前，先宣誓棄絕聶派謬誤的道理。從此以後，羅馬教友當然承認他是正宗天主教的信友了。

同時，耶巴拉哈三世，似乎也因此歸向了羅馬。掃馬不但受教宗的委托，把回覆耶巴拉哈宗長的覆書，交他帶轉，還叫他傳達十四年前里昂公會議時彌額爾巴賴勞古(Michael Palaeologus)所容納的爲希臘教派用的信仰方式的原案。這位聶派宗長，對於這種方案，當然接受遵行，不容疑

慮。有幾個作家說，他確實聲明相信耶穌爲人又爲天主。和天主聖神，是由天主父和天主子共發的。二端道理；因而把聶派，和希臘教派的謬說，完全推翻（註八）。別的事情且不論，便是在相近一二九〇年時的時候，他完全贊同天主教傳教士蒙克勞知（Piccolo di Monte Croce）的道理，還對蒙克勞知說：『他個人不是個聶派教徒，他並不信從聶斯多略的道理』（註九）。至於他承認羅馬教宗一層，我們看了他一三〇四年，五月十八日寫給教宗的信，便可以知道他是多麼心悅誠服，無以復加。在這封信裏，他說道：『我們相信羅馬教宗是至聖，至高，普世信衆的共父，承認他是聖伯多祿的繼位人，耶穌基督普世的代牧，統轄從東方到西方教會一衆的子女……我們應當服從他，懇求他降福，準備接受他一切的命令……既然我們都是信奉基督的弟兄們，還因着真實的公教信仰，做了他的兒子，我們願意這位好父親，不要轉過臉向着我們，還願意他不棄卑微，把我們所該做的事，寫信來訓示我們，好提舉我們的精神，到快樂安慰的境界』（註十）。

（註一）模勒氏，九四至九六頁。參閱通報一九三一年，二一〇頁。

（註二）關於這個名稱的異同，參閱通報一九一四年，六三四、至六三五頁。

(註三) 模勒氏，九六至九七頁。

(註四) 同上，一〇二頁。

(註五) 同上，一〇七至一一〇頁。

(註六) 同上，一〇六頁。

(註七) 同上，一一一頁。

(註八) 模勒氏 (G. B. O'Toole) 蒙語譯音 (John of Montecorvino) 見輔仁大學雜誌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一九二九年，四一頁。

(註九) 公教神學辭典 (Dictionnaire de Theologie Catholique, XI) 一九三一年，聶斯多略派 (Nestorienne Eglise) 二三三行。

(註十) 模勒氏，一二三至一二四頁。參閱 Etudes 一九一〇年一二四編，一五頁，註一。

五 第一個天主教傳教區

中國第一個天主教傳教區的創始人，是一個意國藉的方濟各會士，名叫喬伐尼蒙高味諾（一二四七至一二二八年）。他生長在意國薩萊諾（Salerno）附近的蒙高味諾魯物拉（Monteorvino Rovella）地方（註一），後來進了方濟各會傳教士，先到近東，後到遠東。他在一二九四年，以教宗欽使的名義，到了上都，即北平（註二）。元世祖忽必烈的孫子成宗（鉄木耳）接待他極爲恭敬。不久，他就開始傳教工作。

便在初到中國的那一年上，他勸化了高唐王闊里吉思（Prince George of Tendue）（註三）信奉聖教。這高唐王的封域，是在長城以北，綏遠的東南部。他是成宗的近親，先娶過成宗的姊妹，她死了以後又續娶他的女兒（註四），在一二九六年上生了一個兒子。這個兒子的領洗聖名叫朮安（註五）——就是若望（John）意文叫喬伐尼（Giovanni）——是爲紀念這位傳教士而起的。那

時喬伐尼獨自在中國住了九年，直到一三〇三年，纔有一個德國修士亞諾爾德谷洛尼（Arnold of Colsgne）來和他同住（註六）。

在一二九八至一二九九年間，剛巴里克——就是上都（北平）——第一座教堂落成。一三〇五年，又添造了第二座；第三座是在一三一八年以前造成的（註七）。喬伐尼似乎預先見到有成立國籍神職班的必要，因此收了大約有四十名的男童（他們都是外教人家的子弟，年紀從七歲到十一歲），給他們付洗，教他們拉丁文，和聖教禮儀。他又教他們組織了一個唱經班專唱聖教歌詠。他把新經和聖詠，譯成了蒙古文，或稱畏吾兒（Uigher）文，似乎是特地爲他們譯出的。他又和高唐王商定了一種辦法，把全部辣丁文的日課經譯出（註八）又爲他們寫信給方濟各會的總會長，請他寄下一本譜着曲調的聖咏，一本致命聖人傳，和兩本唱經的書。

他怕一朝身死，他所開創的這種偉大事業，說不定要就此消滅，所以在一三〇五年上，寫了一封動人的書信（註九），寄給他的同會弟兄們，請他們把這封書信的內容，轉稟教宗，他委實覺着自己孤立無援，有添派人手的必要。他說：『我只消有兩三個同志來幫助，也許大可汗本人，已經領洗

了』(註十)到了下一年，他又寫了一封信(註十一)託真福多默多朗底諾(Tommaso da Tolentino)帶給那時住在法國巴底愛(Poitiers)的教宗格勒孟五世(Clement V)這位真福也是得到特准，可以代在中國的遠方傳教會，直接稟報教宗，及羅馬教的，結果教宗委任喬伐尼蒙高味諾做剛巴里克(北平)總主教，兼東方全境宗主教；又由三位樞機，祝聖了七位方濟各會修士，做主教，好教他們到中國去祝聖喬伐尼，和做他的助理。這七位方濟各會的主教，是安德肋貝魯日亞(Andrea da Perugia) 日辣多阿布意尼(Gerardo Alburni) 貝來格理諾加斯夕勞(Peregrino daCastello) 尼各拉龐謝(Nicola da Banzia) 安德肋西亞細西(Andruecci T'Assisi) 伍立克馮賽弗里篤(Ulric von Seyfridsdorf) 和奇耀謀味拉諾伐(Guglielms da Villanova) (註十二)最後這一位，是否到了中國，我們不能知道。但無論如何，他是在一三二七上，死在得利斯帶(Trieste)主教任上的。其他的六位，於一三〇七年秋間，啓程前往；其中有三位，就是上述七人中最後後及的三位，都在印度死了。餘下的三位，於一三一三年(註十三)到了中國，祝聖喬伐尼做上都總主教。

這位新任總主教，於一三一三年，在刺桐——福建泉州——添設了一個主教區。派日多辣做

第一任主教(註十四)那裏的大聖堂是一個有錢的亞美尼亞太太出資建造的。他又派修士們到浙江的杭州和江蘇的揚州去開教。一三一八年間，襄助上都總主教辦事的，是安德肋貝魯日和伯多祿費倫才(Pietro da Firenze)兩位主教(註十五)。

不多幾年後，就是在一三二二年上(註十六)又有一位意籍方濟各會士(註十七)和德理包戴諾(即真福和德理)(註十八)(一二六五至一三三一年)同了一位修士愛爾蘭雅各伯(James of Ireland)到了中國，在福建泉州登陸。和德理便在泉州遇到了兩座方濟各會修院。後來他離開北上，取道福州、杭州(註十九)、南京、揚州(註二十)、臨津、濟甯(註二十一)沿着運河，一路到了上都。(註二十二)他在那裏耽擱了三年(大約自一三二五至一三二八年)勸化了許多人信奉天主教。大約他於一三二八年離華回歐，目的是在請求教宗派遣五十個教士和他一起回到中國傳教。他一路向西進發，經過陝西、四川、西藏、巴大格山(Patalahar)和波斯亞美尼亞等國，終於在一三三〇年間，到了意大利；一三三一年一月十四日，在烏地納(Udine)地方逝世。

一三一八年刺桐第一位任主教日辣多阿布意尼逝世，貝來格理諾加斯勞便奉派做了他

的繼任人。可是他又在一三二二年間去世了，他的後任，是安德肋貝魯亞。這位主教到任後，又造了一座聖堂，一座規模較大的修院。這些新建建築剛完工，安德肋主教，也在一三二六年上病故了。而且他去世後，竟沒有人繼續他的職位。

後來一三二八年，上都總主教逝世後，也遇到了同樣的情狀，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在一三三三年上，纔得到了喬伐尼蒙高味諾總主教逝世的消息，便委派了另一方濟各會士，叫尼各拉的，去繼續他的職位，但是這位總主教，究竟曾否到任就職，這是一個大大的疑問。一三三六年間，一班奉教的阿蘭 (Alains) 族人 (註二十三)——其中有幾個是當朝極品大員，連首相也在內——趁着元帝遣使到教廷的機會，便備了一個公稟，呈請教宗續派欽使 (註二十四)。這回到羅馬的一行人，共有十六名。安德肋弗蘭克 (Andrew the Frank) 是領袖。他們在一三三八年上到了亞味濃 (Avignon) 教宗本篤十二世，於是派了若望馬里諾利 (Giovanni da Marignoli) (註二十五) 充任教廷專使。馬氏於一三四二年來到中國 (註二十六)。但是他看見那時候政潮險惡，朱明聲勢日盛，元室不久就要推翻，深怕大亂即在目前，因此於一三四五年間，啓程回歐，雖經元帝懇切挽留，也只得置之不顧。

可是他於一三五二年（註二十七）回到了亞味濃之後，却竭力陳說必須派遣傳教士前往中國，教宗依諾增德六世，步着歷任各教宗的後塵，請方濟各會總會長選派該會司鐸，到中國傳教，還教他保舉幾位，祝聖主教。但是關於這件事情，該會的年鑑中曾悲慨地記着道：『因為後來負有促進這種事業的責任的人們，處處缺乏熱忱，以致傳教事業，鮮有進步』（註二十八）。此外，奉委任職上都主教的人，還有三個：一個叫默多（Tomasso）（一三六二年，六月十七日）一個叫奇耀謀（伯拉篤）（Guigliemo del Prato）（一三七〇年三月十二日）最後一個叫雅各伯加布阿（Giacomo da Capua）（一四二六年十月二日）但是這三位主教，一個也不會到任。（註二十九）。

這樣，在中國的天主教，第二次消滅了。一切都毀滅了。關於這回天主教福音，第一次傳到中國的結果，我們所找得到的考據，真是少得很。據概括的報告歸化聖教的約有三萬人。可是這一次天主教傳入中國，對於中國民衆，究竟有沒有重大影響，却也有些可疑。因為歸化的雖則不少，可是大抵不是漢族人民，尤其是阿蘭人和蒙古人居多數（註三十）。

當時方濟各會教士們所留下唯一有根據的遺跡，（註三十一）是一本拉丁文的聖經。這本聖經，

是十三世紀的東西，大約是在意大利北部寫作的。這是耶穌會修士柏應理 (Couplet) 在江蘇常州地方，一個外教人家裏覓得，據說是他家的祖先，從元代傳下來的。在十七世紀的末葉，柏氏把這本聖經帶回歐洲。今藏在意國弗勞倫斯的老楞佐圖書館中，至今保存着（註三十二）。可是新近又找到了一隻聖爵。（註三十三）。這也許是同時代的遺物（註三十四）。

（註一）關於蒙高味諾氏的誕生地，見 *Osservatore Romano* 一九三二年，一六三二八六號，又一九三三年，七二號。又要達氏：「若望蒙高味諾傳」[*Jorio: 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Montecorvino Rovella*] 一九三二年，和這個意見相反的言論，見 *Osservatore Romano* 一九三二年，二六八號。

（註二）通報一九三二年，七九頁。溫加爾氏，三四六頁。又全上，*Jean de Mont Covini* 二〇頁，註五。

（註三）見元史卷一一八，八頁，他的聖名叫關里吉思憲義就是喬治。（*George*）關於 *Tenduc* 參閱通報一九一四年，六三〇頁。

（註四）堵勒氏（*John of Montecorvino*）見輔仁大學學誌一九二九年，三六至三七頁。二位王妃的名字，見通報一九一四年，六三一頁。

(註五)見元史卷一一八，九頁。

(註六)溫加爾氏：OIX頁，三四七頁。

(註七) BOP 一九三〇年，三四六至三五二頁，四五八至四六一頁，六三二至六三四頁；一九三一年，三五至三六頁。

(註八)溫加爾氏，三五〇頁。

(註九)全上，三四五至三五一頁。

(註十)全上，三四九頁。

(註十一)全上，三五一至三五五頁。

(註十二)全上，LXXXV-LXXXVI頁。

(註十三)模勒氏以爲大概安德肋貝魯齊亞信中的日期“Millesimo, CCCXVIII”裏邊這V字該刪去那麼便得到一

三二三的年期。見模勒氏，一九一頁，註四十八。

(註十四)參閱馬武洛氏(H. Marrod)真福和德理(一二六五至一三三一年)傳註見巴黎一九二九年(Études Françaises)的摘錄。又真福和德理六百週年紀念刊(VI Centenario del B. Ordorico da Pordenone)一冊。

五一至一五三頁。

(註十五)溫加爾氏,三六七頁。

(註十六)真福和德理傳中,除和氏所著的回憶(一三三〇年)和他的去世日期(一三三一年)外,所有的日期,都不能明白知道。然而那堪稱信史的方濟各會史作家日羅尼莫郭樂包維(Fr. Jersme Golubovich)司鐸關於和氏的年譜,却歸結到以下的按語:據他說,和氏生於一二六五年,十五歲上進方濟各會——就是說,在一二八〇年左右——二十五歲上晉陞司鐸;(一二九〇年)他第一次到東方,是在一二九六年;後來他回到威尼司(Venice)又在二一三一年上,從威尼司到了遠東。一三三〇年,他重新回到意國,翌年(一三三一年)一月十四日逝世,享年六十五歲,或六十六歲。

參閱方濟各會私史(Archivium Franciscanum Historicum Anno X)(一九一七年)一至二 fasc 一七至四六頁。又 Bibliotheca Bio-Bibliografica di Ferra Santa, III, 1919, 三十四至三九三頁。又 INuovi e piu Accertati Dati Cronologici del Beato Odorico 見真福和德理六百週年紀念刊一冊,一九三〇年,第三號,四一至四三頁。但是模勒氏對於這種意見,是完全一樣,參閱通報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二七五頁至二九〇頁。又模勒氏二四一頁註

(註十七)和氏實在誕生於意大利，不是在波默米亞 (Bohemia) 已由凡那齊奧薩維 博士 (Dr. Venanzio Savi) 切實證明，見 Nuovo Archivio Veneto, Anno VI, T. XI. 一八九六年，三〇一至三二五頁。參閱眞福和德理 六百週年紀念刊一冊，一六五至一六八頁。

(註十八)和氏族姓馬底烏西 (Mattiusi) 誕生在包戴諾 附近，一個叫維拉諾物 (Villanova) 的小村子裏。參閱眞福和德理 六百週年紀念刊一冊，五六至五八頁。

(註十九)他在杭州 遇到了四個方濟各會士，和奉教的商人，或旅客們同行，一個奉教的大員，選請他到家裏，稱呼他「阿太」(神父)說他是一個「Raban Franchi」。參閱溫加爾氏 卷一，四六五至四六六頁。又通報 一九一四年，四四九頁裏說「阿太」這兩個字，正和土耳其話裏的「神父」般無二。閱 Le Petit Messager de Nimpo 一九一六年七月，至一九一七年八月，所有關於和氏在浙江 時種種的記載。

(註二十)那時候，揚州 有一座方濟各會修院，三座孟派 教堂，其中的一座，是十三世紀末葉一個富商叫亞伯拉罕 的建造的。參閱溫加爾氏 四六九頁。又通報 一九一四年，六三八頁。

(註二十一)參閱通報 一九一二年，四三一至四三三頁。

(註二十二)參閱溫加爾氏，四七四頁。

(註二十三)中古時代的阿蘭人，大都散居在高加索山一帶，中國歷史上稱奄蔡人或阿蘭人。參閱通報一九〇五年，五五八至五五九頁；一九〇七年，一九五頁；一九一四年，六四一、六四三頁。

(註二十四)這封信的辣丁原文，見溫加爾氏 LXXXIII 頁。英譯文見模勒氏，一九六頁。參閱通報一九一四年，六四二頁。

(註二十五)按當時文籍，中國的作家都稱喬伐尼 (Giovanni) 爲「岳忽羅」參閱張氏二集，二三一頁。

(註二十六)元帝成宗 (Toghhan Timur) 曾於一三三六年囑安德肋弗蘭克向教宗轉言，叫他送「馬匹和其他奇妙的東西」。

參閱溫加爾氏 LXXXII—LXXXIII 頁。又模勒氏 二五二頁。事實上，若望馬里諾利於一三四二年，八月十九日，謁見成宗，以教宗名義奉贈駿馬一匹。參閱溫加爾氏，五二八至五二九頁。因着這個機會，中國文學士們，便做了許多詩、文、頌賦，來記述當時拂朗國華美的貢贈，有幾篇載在張著，二集，二二二至二三一頁。又六集，五六七至五七〇頁。那時候，還有畫家繪了一幅畫像，繪元帝在這匹馬上騎着。這幅圖畫，在一八一五年上還存在着。(參閱通報，一九一四年，六四二至六四三頁)。但是中國人畜馬，遠在天主教傳入之前，可閱徐傳保氏 先秦國際法之遺跡，二八二頁後之插圖。

(註二十七)溫加爾氏，五一八頁。

(註二十八)見方濟各會年鑑 *Analecta Franciscana*, III 五四八頁。Chronicae XXIV Generalium 內有“*Tamen tepes centibus illis hinc inde qui negotium debebant promovere ulterius modicum est processus*”等語。該書大半是在一三六九年以前寫作的，所以和他們所講述的事，是同時代。參閱真福和德理六百週年紀念刊，一冊，一八一頁。又輔仁大學雜誌，一九二九年，一七頁。

(註二十九) *Ethudes*, 一九一〇年，卷一二四，一九頁。

(註三十) 模勒氏說：「在一千五百年的長久時期裏，只有兩個，或者至多三個考據，表示中國信徒們的存在。」見模勒氏，一五〇頁註十七。又說：「古代，和中古時代，中國信徒們的故事，並不是天主教的教會在中國開始成立的故事，却多少在名義上，或是在實際上，是信奉耶穌的外國人，在中國久居，或是暫居的記載。」見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一九三二年，四五六頁。「中國古代景教的失敗。」可是溫加爾氏却仍力求找得一種比較樂觀的見解。他的結論，大都根據於「外教的歸化」。然而勃魯格 (*Brucke*) 司鐸持着反對論調。他以為喬伐尼蒙高味諾所有表明古經，和新經上事蹟的油畫，上面題着拉丁文，波斯文，或是畏吾兒 (*Tiger*) 文，却總沒有中國文字，便推測說：「他所付洗的外教人，大概都是，或者差不多都是屬於中亞細亞民族的人，就是和蒙古人聯盟，或是做了他們屬國的民族；他們

已經給孟派擇得了不少新教友了。」(見 *Études* 一九一〇年一二四卷,二〇頁)無論如何,「在中國地方,總沒有找到過甚麼人家,可以說得是從蒙高味諾和他的同志們所動化的天主教信友們傳下來的。」(同上,二五頁)便是伯希和教授也執着說:「這十三四世紀中的遠東基利斯督教化,大抵是非中國人的基利斯督教化。」(《通報一九一四年,六四三頁)。

(註三十一) 溫加爾氏 LXXXIX—XC頁,這可以看到其他不多幾個的遺物。參閱 *BOp* 一九二六年,三九〇至三九一頁。

(註三十二) 樸勒氏,八五頁。

(註三十三) 德禮賢氏 (Paschal M. D'Elia) 一個尋獲一個十四世紀中國天主教的聖爵 (Une trouvaille? Un calice catholique chinois du XIV siècle) (見 *COS* 一九三〇年,七一五至七二三頁) 又司巴達氏 (N. Spada) *Recueil de Feng ch'ao* 見 *Arte Cristiana*, 1932, Febbraio (一九三二年,二月),三四至三七頁。

(註三十四) 關於中國最初的方濟各會士,可閱高田氏 (H. Cordier) 「蒙人治下的中國和中亞基利斯督教化」(Le Christianisme en Chine et en Asie Centrale sous les Mongols) 見通報,一九一七年,九〇頁。

六 閉關時代

自從蒙古人帖木蘭 (Tamerlane) (一三三六至一四〇五年) 侵入了歐洲以後，把西方人來華的路徑堵塞了。同時中國也閉關自守，和世界斷絕往來。

因着那精通馬可孛羅著作，十五世紀中最著名的宇宙學家保羅董思格內里 (Paolo Toscanelli) (一三九七至一四八二年) 的指導，哥倫布想用西向航行的方法，來找到遠東。因此，他於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航行到了三薩爾伐多 (San Salvador) 他便以為印度，中國相去已不遠了(註一)。便是在一五〇三年上，他熱切的願望，還是要把中國皇帝久候光降的傳教士們，由海道送到中國。然而這個目的，哥倫布沒有達到，却給伐斯戈特茄馬 (Vasco da Gama) 獲得了一部份成功的榮譽，在一四九八年上，尋得了到印度的海道。

傳教士們在從印度到日本的程途中，沒有忘却在中國閉關着的門戶上，扣了一下。

十六世紀中，第一個去敲這扇關着的大門的，便是那偉大的「東洋宗徒」聖沙勿略方濟各。他在印度、日本，傳佈了福音之後，知道使全中國人民歸化聖教，委實是無上的要圖（註三）。他一心想到中國傳教，而且爲了這個緣故捨了生命。事實上，他於一五五二年，十二月三日，死在上川島上（註三）。這個小島對着廣東海岸綫，正在中國門戶之外。他雖則不能走進他所期望着的地方，却曾預言過他的同會弟兄們，將來要在這海禁森嚴的中國境內，收得神奇的功效（註四）。他這種熱心傳教的精神，志切救靈的表樣，却激發了傳教士們的勇氣和熱忱，不但和他同會的耶穌會士接踵而來，便是其他各修會的會士，像多敏、我會、奧斯定會，和方濟各會等的教士們，也聞風興起。三十年間，教士們絡繹東來，前仆後繼，百折不撓，用了種種方法，想走進這個禁地。

自從中古時代，方濟各會教士們來華以後，第一個得到了許可，在中國登岸的傳教士，是一個葡籍耶穌會士，梅吉歐農乃斯白來篤（Melchior Nunez Baroto）他在到日本的途中，遇到了暴風，就被迫改向中國海岸進發，於一五五五年七月的中旬（註五）到達了三年前聖沙勿略所到過的上川島。同年八月至十一月間，他曾經兩次到過廣州，去援救三個被拘囚的葡萄牙人，每次住了足

有一月(註六)到了下一年，就是一五五六年，他又去了一次(註七)。從一五五五年八月起，到一五五六年六月止，他寄寓在澳門，(註八)在那裏行彌撒；從一五五年十二月起，到翌年六月止，(註九)在居留澳門的三百多葡人社會中，舉行聖祭，和做着傳教工作，有很好的成績。最後，他於一五五六年六月間，到日本去了。一個襄助他傳教的修士，叫斯德望葛斯(Stephan de Goss)留在廣州，學中國話，但是不久就害了病，不得不離粵他去(註十)。

一五五六年間，廣州官廳准許一個葡籍多敏我會士，茄斯巴克羅自在廣州留住一個月(註十一)到了一五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又有一個耶穌會士，方濟各畢雷(P. Francis Perez)請求准在中國居住，但是不會如願(註十二)。此後，在一五六八年(註十三)一五七五年，一五七九年，和一五八二年間，更有其他的耶穌會，奧斯定會，方濟各會等修會的教士，來作同樣的嘗試，可是結果，都是一樣的不利。在一五七七年間，有兩個西班牙籍的奧斯定會士，瑪爾定海拉大，(Martino de Herada)和日羅尼莫馬里諾，(Jeromino Marino)從菲列濱羣島，到過中國沿海地方，如福建的漳州，和浙江的杭州等處。一五七九和一五八一兩年年上(註十四)，兩個方濟各會修士伯多祿亞法祿

(Pedro de Alvaro)和瑪爾定歐那濟(Martino Egnatio)也會到廣州來過。最後，在一五八〇至一五八三年間，耶穌會司鐸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S. J.)曾在廣州小住過三次(註十五)，又在肇慶耽擱過一次。

但是以上的幾位傳教士，沒有一個能在中國長久住下。

(註一)參閱紐約出版公教通典(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N. Y. XIV)卷十四，七八六至七八七行。又通報，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六四至六七頁。

(註二)耶穌會史記(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tatis Jesu)沙勿略傳記(Monumenta Xaveriana I)一冊，一三九至一四〇頁；六六三至六六四頁；六七二頁，六八四頁，六九五頁。

(註三)Monument Xaveriana I，七九一至七九四頁註三；八一三頁，九三〇頁。

(註四)全上，六七二頁，有一五五二年一月二十九日聖沙勿略致聖依納爵函，又參閱全上，六九五、八〇六頁。

(註五)閱白來篤氏一五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自澳門寄發的葡文原函，意大利譯文見 Diversi Avvisi particolari

Tale Indie di Portogallo ricevuti Tali anno 1551 fino al 1558 Tali Reverendi Padri della Compagnia

di Gesu (Venezia) 1558, f. 266 V. 又白氏一五五八年一月九日自交趾 (Cochin) 寄發的函件, 意大利譯文見 Nuovi Avvisi Tell' Indie di Portogallo... Venezia, 1559, ff. 42—53 又魯雲弗羅 (Louis Froes) 一五五六年一月七日函, 見 Diversi Avvisi Particolari Tell' Indie di Portogallo, 一五五一年—一五五八年, 二七—二七八頁。

(註六) 一五五五年來函, 見 Diversi Avvisi 一一—一頁。

(註七) 一五五八年函, 見 Nuovi Avvisi 四四頁。

(註八) 同年來函, 見全上四二頁。

(註九) 同年來函, 見全上, 四二至四三頁。

(註十) 同年來函, 見全上, 四四至四五頁。

(註十一) 羅茄氏原著 Tractado en guese cõtom Muito por esteso as cousas da China, co suas particularidades, e assi do reyno d'Ormuz, Evarra, 1569.

(註十二) 巴爾圖氏 (Barthol) 中譯羅雲弗羅會談 (Dell' Historica della Compagnia di Gesu Ia China.) 羅譯一六六

三年，一五〇一至一五三頁。

(註十二)閱 Lettere Teil' India Orientale，威尼司，一五八〇年，七七頁，內稱一五六九年一月二日以前，兩個耶穌會士，愛瑪虞戴才拉 (Emmanuel Texeira) 和 方濟各 曾到過廣州 好幾次。

(註十四) 公撒茶 哥爾薩 (J. Gonzalez de Mendoza) 著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os y costumbres de gran Reyno de la China 羅馬，一五八五年。

(註十五) 利瑪竇 二冊，四〇四頁。

七 近代的先驅利瑪竇

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有今日這樣的組織，却該歸功於意籍耶穌會士利瑪竇（註一）。利氏於一五五二年十月六日，在意國馬知拉打（Macerata）誕生，那時正值聖方濟各沙勿略去世前兩個月。他於一五七一年，八月十五日，進了在羅馬的耶穌會，一五八二年，八月七日，到澳門，在他進會後十一年。這澳門地方，是在利氏來華二十多年前（一五五七至一五六一年間）由中國政府劃給葡萄牙人作居留他的。耶穌會士們，在一五六二年前，便在那裏創立了一座會所，後來在一五七六年前，創立了一個主教區。

利氏到澳門後，過了一年多一點的光陰，畢竟於一五八三年，九月十日，達到了他的目的，和羅明堅回到肇慶住下。那時候肇慶是兩廣的省會（註二）。一五八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他又向北方推進，移居韶州（註三），在肇慶住了六年。一五九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他初次到了南京（註四），但是因

爲不能在南京久住，所以又折回了江西的南昌；同年六月二十八日，便在南昌再創辦了一座教堂（註五）。他第一次到北京，是在一五九八年九月七日，却也不能久住（註六）。可是他回南的時候，竟獲如前願，於一五九九年二月六日，在南京住下（註七）。最後，他於一六〇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註八），第二次北上，得在北京住下，直到一六一〇年五月十一日（註九），他去世時候爲止。

利氏和他最初的同志們，優美的特點，是「處事謹慎，待人和藹；『感覺敏銳，學術精深。』」那時候，中國人士往往喜歡探問他們來華的宗旨。他們便明白回答：他們是天主教司鐸；『夙聞貴國政治昌明，私心仰慕，所以不辭跋涉，遠道西來，欲求皇上隆恩，准賜終身寄居貴國，以便奉事天主』等語（註十）。同時，他們在談話之中，每每要轉轉彎彎，使中華人士，覺得他們也許有新穎有趣味的學術，可以教給他們。西士們利用他們從歐洲帶來的各種東西，如鐘錶，三稜玻璃柱，和算術上，天文上的儀器；地理學、宇宙學、和建築學的作品；地圖，和巨大的書帙；裝潢華麗的聖經，以及各種畫像，和油畫等，求達到他們的目的（註十二）。一時在朝的鴻儒碩學，達官貴人，以及各省的督撫司道，南北兩京的高官顯宦，踵門請見，殷勤結納的很是不少。利氏對於中國文學，下過一番研究功夫，造詣很深，四

書五經，都能熟讀；所以和他們週旋應對，談得很是投機。他又善能引據中國經典，來證明天主教道理。不多幾時，各省便盛傳中國來了一個極有學問的西洋人。又因他在一五八四年上，製成了一幅坤輿萬國全圖，以後復時加改善；歷年來又用中國文字，著了許多書，或是請他最先勸化信奉聖教的翰林學士，或是高官顯宦們代為撰作，所以他的聲名，更覺蒸蒸日上。

(註一)凡欲研究自一五八三至一六一〇年間，中國天主教傳教的歷史，不可不參考利氏的回憶錄(Commentary)以及他和他最初同會的書信。這回憶錄及書信二種是在三百年後發現的，由著名史學家耶穌會士大其氏(Tr. Pietro Tacchi Venturi, S. J.)費了許多光陰心力搜集，審核刊行。定名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 J.*

馬知拉打一九一一年第一冊，一九一三年第二冊，現正準備再版。

(註二)利瑪竇一冊，二二三頁。

(註三)全上二冊，七七至七八頁。

(註四)全上，二冊，一四〇頁。

(註五)全上，一冊，二五七頁。

(註六)全上，一冊，二九三頁。

(註七)全上，一冊，三〇五頁。

(註八)全上，一冊，三六五頁。

(註九)熊三拔氏利瑪竇傳 *De Tris. P. Mathews Ricci, S. J. Relacao* 羅馬，一九一〇年，五六頁。參閱利氏傳教行程

圖，見 *The Rock* 一九三〇年，九頁對面。

(註十)利瑪竇傳一冊，一一九、一二四頁。

(註十一)全上，一冊，一七九至一八〇頁；一四一至一四三頁；一三三至一三四頁。

八 利瑪竇的收穫

十六世紀中，研究天主教第一部中文作品，耶穌會司鐸羅明堅氏所著的天主實錄，是在一五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刊印出版的（註一）。這部書，後來因着利瑪竇氏著了一部屬於宗教辯護學的傑作，而堙沒無聞了。利氏的作品，初名天學實義，後改名天主實義，是在一五九三、至一五九六年間撰作的（註二）。這部書才脫稿，已經傳讀得很廣（註三），到一六〇四年上，利氏才在北京付印（註四）；五年中（一六〇四、至一六〇九）在他省再版了四次，其中兩次，是由那時還沒有奉教（註五）的兩位大員，進士馮應京（註六），和李之藻（註七），刊印的。這部著作，在中國文學界風行了很久。後來清帝康熙因着牠的潛移默導，竟於一六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頒佈了一道解放宗教的詔諭。（註八）。便是壓迫天主教的乾隆，也把牠收入四庫全書（註九）。

第一次非公開式的付洗，是在一五八三年，年終，或者至多在一五八四的年初時候（註十），領

洗的是一個將死的老人。一五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廣東肇慶給一個出身福建的秀才，行付了第一次公開式的洗禮，洗名保祿。同時領洗的，又有一個肇慶的青年。他在一五八三年，五月至八月間，始創「天主」的名稱（註十二）。他的洗名叫若望（註十二）。

從那時候起，這一粒播下的小籽種，便漸漸生長起來了，雖則長得嫌遲緩，却是穩固地，不住地恆長着。在一五八四年中，天主教信友，祇有三個（註十三）。一五八五年，有十九，或是二十個（註十四）。一五八六年，有四十個（註十五）；一五八九年，有八十個（註十六）；一五九六年，有一百多個（註十七）；一六〇三年，差不多有五百個（註十八）；一六〇五年，有一千多（註十九）；一六〇八年，有二千多（註二十）。那麼，我們可以推測在一六一〇年間，這位近代中國傳教區的創造人利瑪竇氏去世的時候，中國已有了二們千五百個天主教信友了。

這個數目，在我們看來，似乎很微幾，要知道當時開教，障礙重重，困難到極點，幾乎沒法排除。這樣的成績，在利氏眼中，已是『全能天主親手做下的一個很大的聖蹟了』（註二十一）。就利氏個人講，他勸化中國人歸正的功業，不在其他自宗徒時代，直到如今，任何國都的成就之下』（註二十二）。

但看他最先勸化的信友中，竟有佔着社會上最高位置的人們，爲朝廷所推重的鴻儒碩學，高官顯宦。那麼，這班人皈依他傳揚的聖教，不是足證天主教確有絕大價值嗎？

說到這裏，我們不得不起幾個利氏的時候奉教的大人物了。一個是浙江仁和人，李之藻。他在萬曆二十六年上成了進士，官做到太僕卿，他是在一六一〇年四月間，利瑪竇去世前幾天領洗的（註二十三），洗名良。一個是江蘇常熟人，瞿汝夔，太素，他的父親是赫赫有名的禮部尙書瞿文懿公。是一個中國當代最有學問的人；太素歸奉天主教，是在一六〇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註二十四）洗名依納爵。還有一個是南京通政司進士許某；他於一六〇九年間領洗，（註二十五）洗名若望。最著名的便是那一六〇三年領洗的，上海徐光啟氏，洗名保祿（註二十六）；他便是那明朝的大學士，中華聖教多年的柱石，徐文定公。至今上海西鄉徐家匯——文定公的故里，現在天主教南京主教區的中心——「徐閣老墳」還保存着，墓址在那世界聞名的徐家匯天文台西北，相距約有幾百碼的地方。據宋倪氏太夫人（一八六九至一九三一）左右聲稱，太夫人的母親徐氏，伊的外祖父徐福運，是文定公十六世孫（註二十七）。這話如果真實，那麼，太夫人的哲嗣宋子文氏和伊的三位東牀快婿，中華民國

的國父孫中山氏，現任財政部長的孔祥熙氏，和前國府主席蔣中正氏，也都是文定公的戚屬咧。

(註一) 利瑪竇二冊，四三〇頁。參照四二七頁。

(註二) 全上，二冊，一一七、一二二、二二五頁。

(註三) 同上，一冊，二七二、四五七頁。

(註四) 這書刊印的時期，有利氏親筆文件證實，而且不止一件。參閱利瑪竇二冊，二五六、二六五、二七一、二七七、二九六頁。

(註五) 利瑪竇一冊，四五九頁。

(註六) 同上，一冊，四九五頁，又巴篤里氏著中華耶穌會史五二一頁。

(註七) 同上，一冊，三九六頁，二冊，三三四頁，又巴篤里氏，五二一頁。

(註八) 見白晉司鐸 (Bourne) 一五九七年十月十五日，在豐蒂納波錄 (Fontainebleau) 所寫的手抄本。參閱 Drouot 1

九一〇年。卷一二四、七七二頁(註一)。

(註九) 四庫全書中乾隆所採集的天主教西士們所著的書籍，多至二十四種。其中十一種列入「著錄書」，十三種列入「存目書」，這二十四種中，却有八種是利氏的作品。

(註十)利瑪竇一册，一三三頁。

(註十一)同上，二二六頁。

(註十二)同上，一册，一四九頁；二册，四二九、至四三〇頁。

(註十三)同上，二册，五二頁。

(註十四)同上，二册，六三、七一頁。參閱同上五五頁。

(註十五)同上，二册，四四九頁。

(註十六)同上，二册，九二頁。

(註十七)同上，二册，二三一頁。

(註十八)同上，一册，四〇五、四三〇、四四一頁。按韶州自一五九九至一六〇二年間，領洗人數在三百以上。南京自一六〇〇、

至一六〇二年間有一百餘人，北京自一六〇二至一六〇三年間，約有七十人。

(註十九)利瑪竇，二册，二五三、二六二頁。

(註二十)同上二册，三三一、三四〇頁。

(註二十一)同上，二冊，二五三頁。參閱同上，三四六頁。

(註二十二)同上，一冊，四四八頁。參閱同上，二冊，二八一、三六六、三八三頁。

(註二十三)同上，一冊，六一三頁，註四。又熊三拔著「耶穌會士利瑪竇傳」，五二頁。參閱輔仁大學學誌，一九二九年，六九至七二頁。張著，二集，四四三至四四六頁。陳垣氏：李之藻傳。

(註二十四)利瑪竇一冊，四九〇頁。

(註二十五)同上，一冊，五九二頁。參閱金尼各氏 *Litterae Societates Jesu e regno Sinarum annorum MDCX et*

XI, *Angustiae Vindelicorum* 一六一五年，五〇等頁。

(註二十六)同上，一冊，四三四頁。參閱章立氏「徐光啓傳略」(Notice of Sen Kwang Ke, by Wylie, cf.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c. 675) 見 *North China Herald*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七八至七九頁；十二月二十日，八二至八三頁；十二月二十七日，八五頁。又一八五二年，一月十日，九三頁；一月十七日，九八至九九頁；二月七日，二〇頁。二月二十一日，一一八至一一九頁。參閱張著，第二冊四四一至四四二頁。又徐宗澤司鐸著，文定公徐上海傳略，又蒙他篤氏：

西洋科學在中國的左祖 (O. A. Montalto de Jesus: *The Maecenas of Western Science in China*) 見

The East of Asia 上海一九〇四年三册一四八至一五七頁參閱白列門氏 (B. O. Brifman) Paul Suisse-
pology of the Jesuits in Chinese Repository, XIV 一一八至一三五頁。文定公逝世日期 (一六六三年十一月
八日) 見通報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七四頁。

(註二十七)參閱 OCS 一九三二年六九至七十頁。

九 進步時代

利瑪竇進了北京，便在傳教事業上，立下了很好的基礎，所以他去世以後，中國教務，並不受着重大的影響。而且還有許多有學問，有才德的耶穌會教士們繼續着，發展他的傳教事業，其中有幾個是很值得我們記憶的。比方意國人龍華民（Longobardi）是第一個繼續利氏任會長的；意國人熊三拔（De Ursis）班國人龐迪我（Pantoja）是和利氏同到北京，創立住院的；意國人郭居靜（Cattaneo）是先後在上海（一六〇八年九月間）和杭州（一六一一年五月八日）開教的；比國人金尼各（Trigault）是和郭居靜在杭州共同工作的。意國人艾儒略（Aleni）博通中國經史，故當時人們稱他『西來孔子』（註一）。瑞士人鄧玉函（Terrenz or Schreck）是大物理學家谷離婁（Galileo）的朋友，羅馬科學學會（Accademia dei Lincei）的會員。其他如意國人畢方濟（Sambiasi）、葡國人魯德照（Semedo）等二十餘人，都是著名的算學家，地理學家，語言學家，或是

天文學家。

因着十七世紀中，中國皇帝優禮精通天文的耶穌會士，所以在這一百餘年間，天主教在中國朝野，得到了使人驚奇的進展。

在利瑪竇去世時候，（一六一〇年）天主教信友，約有二千五百。到了一六一五年上，就增加到五千（註二）。一六一七年，有一萬三千。一六三六年的數目，是三萬八千二百；一六五〇年，竟多到有十五萬（註三）。一六六四年，——耶穌會士來華後纔過了八十年——教士們向歐洲報告說，有三十位耶穌會士在中國各省傳教，連最遠的省份在內。已成立的教士住院，有四十二處，聖堂一百五十九座，私立小堂多得不能計數，教友共計二十四萬八千一百八十八人，平均每年增加新教友七千餘名。這個數目，還該加上十個多敏我會，和一個方濟各會司鐸所管轄的天主教信衆。因為他們在一六六四年那一年上，會同管理着二十四座教堂（註四）。

一六七一年四月十八日，殷鐸澤司鐸（*Inforestes*）上羅馬傳信部的報告中，曾說一六六七
年，耶穌會士所管轄的教友，有二十五萬六千八百八十八人，教堂一百五十九座，教士住院四十一所。

多敏我會教士們，於一六五〇至一六六四年間，付洗華人三千四百名，管轄教堂二十一座，教士住院十一所。方濟各會教士們，於一六三三至一六六〇年間，付洗華人三千五百名，管轄教堂三座，教士住院一所。這樣看來，大約在一六七〇年上，中國天主教信友，已有二十七萬三千七百八十餘人了（註五）。

在這二十七萬多信友中，却有許多第一流人物。在將近一六六四年的時候，耶穌會教士們已經出版了一百五十種關於算學、自然哲學和倫理學的華文書籍。此外，關於天主教教理的書籍，數目也是不相上下。一班顯宦名士和富厚的人民，讀了這些書籍中的一兩種，便欣然把他們和他們一家的人名字，送到天主堂登記，準備領洗入教。因此在一六三六至一六六六年的時候，那明末桂王時代，做過司禮監總攬軍國大權洗名叫亞基樓（Achilles）龐天壽也加入了天主教（註六）。

（註一）「西來孔子」一語參閱殷鐸澤氏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巴黎一六八七年一〇頁。

（註二）有金尼各氏手蹟為證。該項手頁，現由北京勒魯蒙皇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Royale）保存。（第三九九七號）

第二頁)參閱 *Etudes* 一九一〇年,一二四卷,二七六頁(註一)。

(註三) 殷澤鐸氏: *Compendiosa Narratione* 羅漢,一六七二年,七至八頁。

(註四) 依據巴黎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所保存葛仲運司鐸(Greslon S. J.)的手蹟,(法字一四六八八號)第一編教難(一六六四年)以前的事蹟。

(註五) 殷澤鐸氏 *Compendiosa Narratione* 七至九頁。

(註六) 龐氏曾於一六五〇年函呈教宗,說他領洗入教,已有二十多年了。

十 在朝的教士

利瑪竇在寫信給羅馬的耶穌會總會長或是給在意大利或在其他任何地方的同會友人們的時候，尤其是在一五九五至一五九六這兩年中，總是堅持地伸說着他完全明白以下兩點是怎樣重要。他說：第一『假使我們不能在南北兩京，到皇宮裏，對着皇上宣講福音，設法求得他的許可，至少許我們在中國境內自由傳教，那麼，將來傳教要得不到保障，也就甚麼不能成就。』（註一）；第二『假使我們求得了這種許可，便可以在短時期內，有幾百萬人歸化聖教』（註二）。因此在開始傳教的時候，利氏就定下了一種計劃，打算請教宗派遣使節來華，和中國皇帝通好。他希望這樣做去，他自己可以因着使署職員的名義，得入禁廷。爲求達這個目的起見，他毫不遲疑，決定和他最初的友伴羅明堅司鐸暫時分手，於一五八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讓他到羅馬去接洽。便是後來這教廷派使的計劃竟歸失敗，他却依舊毅然決然，盡心竭力，來求達他的目的。一五九六年，十月十五日，他

在江西南昌的時候曾愁悶地說道『要去見皇上似乎是不能了』但是他又立刻接着說道『我們在這裏已有了住院，我們要盡我們的能力，在京城裏要去建立一個住院使皇上知道我們來京，再看我們能不能求得他的恩典，准許我們的同會司鐸們自由來到中國』（註三）。

他於一五九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到了南昌之後，便結識了幾個住在本城的皇族，成爲知己，尤其是樂安王、和建安王，待他很多異數。利氏竟也因着後者的請求，做了第一篇中國論文，交友論（註四）。一五九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利氏在寫作中提起，他說：『這位王爺願做一個天主教信友，我想他將來要做到的』（註五）。同年十一月四日，他又筆述道：『這位王爺離開天主國已不遠了』（註六）。

但是利氏並不安閒着；直到他在一六〇一年，一月的時候，在北京蒙朝廷召見，奉上了幾幀最美麗的救世主耶穌像，和童貞聖母像，纔稱了他的心願。那命他入覲的萬歷帝，對於利氏很覺得喜歡，不但要了一個畫匠來，畫他和他同伴的肖像（註七），還叫他們住在皇宮裏，等買下了一座專做教士們住宅的屋子，來安頓他們。他們從一六〇一年，二月間起，住在宮裏，一直住到了一六〇五年，八月二十七日（註八）。

那時候利氏在京，得到了南昌發來的消息，說一位近支的皇族，於一六〇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在那裏領洗了，洗名若瑟。他那宗徒的心神，是多麼踴躍歡欣啊！那裏，耶穌會司鐸李瑪諾（Fr. Emmanuel Diaz, Senior）又於一六〇五年一月六日，三王來朝瞻禮日，給若瑟的兒子付了洗。同時領洗的，還有他的兩個弟弟，和一個表兄，他們的聖名是三王聖名，即梅吉歐（Melchior）茹斯巴（Gaspar）和巴爾德薩（Balthasar）不多幾時以後，若瑟的妻子、母親和其他的六位皇族命婦，也都信奉了天主教（註九）。

在相近十七世紀中葉，明末最後稱帝的永曆帝，據守肇慶的時候，掌握軍國大權的，便是前述信奉天主教的亞基樓龐天壽。他可以自由出入宮廷，便把天主教和耶穌會教士們，介紹給皇家。在一六三六年前，已經有一百四十個親王，四十個皇族，七八十個皇族命婦，領洗奉了教。到了一六四八年，明室將亡的時候，永曆太后赫烈納和馬太后瑪利亞，王皇后亞納，皇太子慈烜，公斯當定也都由耶穌會司鐸瞿安德（Fr. Andrew Xavier Kaffler, S. J.）付了聖洗。兩年以後，龐天壽和皇太后赫烈納，派耶穌會司鐸卜彌格（Fr. Michael Boym）帶信到羅馬——一封是太后寫給耶穌

會總會長的。其餘兩封，是太后和龐天壽分呈教宗的——都請多派耶穌會司鐸，到中國來傳教。皇太后赫烈納信上的日期，是一六五〇年十一月四日；信裏說：

……『更望

聖父與聖而公一教之會祈求

天主保佑我國中興太平俾我

大明第拾捌世孫

主臣等悉知敬

真主耶穌更冀

聖父多送

耶穌會士來廣傳

『聖教』

這兩封信的原文，是於一九一一年，由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張菊生氏在華諦岡圖書館中找見

的(註十)。

利瑪竇死後，明神宗就下了一道詔諭，舉行國葬。他識見遠大，等到葬事辦完，便又於一六一一年間敕令耶穌會修士改中國曆法。這又給與教士們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好借此多和皇帝相好。他們在明代——一六二九年——開始進欽天監服務。到了滿清時代，也依舊繼續供職。

當時精通天文，最負盛名的教士，有意國人羅雅各(Giacomo Rho)(一五九〇——一六三八)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一五七五——一六二〇)瑞士人鄧玉函(John Schreck)(一五七六——一六三〇)尤其是德國人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一五九一——一六六六)和比利時人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一六二二——一六八八)兩氏。湯南兩位還被委任欽天監監正。明代的崇禎帝(一六二八——一六四三)和清代的順治帝(一六四四——一六六二)和康熙帝(一六六二——一七二二)都很尊重他們。除了在教難期內，曾有短時期的間斷外，直到一八三七年止，這欽天監監正一職，都由教士們擔任。是在一七三三年上耶穌會被迫解散以後，該會傳教士的職務，於一七八四年由遣使會士接替，他們當中又有幾位照

常在欽天監供職其中如法國人羅廣祥(Nicolas Raux)葡國人李拱良(Joseph Riberio)(一八一三——一八二六間)和最後任職(一八二六——一八三七間)的葡國人高守謙(Venissimo Monterio de Serra)等尤爲著稱。

湯若望供職欽天監時候，那順治帝不但隨時喚他到宮中相見，叫他不拘禮節，還不顧中國數千年來相沿着的，那神聖不可侵犯的帝王法度，紆尊降貴，屢次突然駕幸湯氏的寓所，往往整天徘徊着，問問這樣，講講那樣，慣用滿洲語稱湯氏爲『馬法』(Mata)卽「親愛的神父」；這樣一年中竟有二十多次。順治帝曾賜給湯若望一個稱號叫「通微教師」，又加封了許多榮顯的官銜。此外在一六五〇年，興建北京第一座天主(南)堂的時候，這位皇帝也捐助了銀一千兩。湯氏見這個中國君主，聽了他明智的誘導，竟有這樣的善意和歡迎，心中便懷着一個希望，希望他將來有一天要歸奉聖教。可是順治帝在肉慾裏沈浸得太深了，總沒有這度着純潔的信友生活的勇氣。然而那時候却有好幾個宮廷的命婦，和在朝的職官做了天主教友(註十二)。

康熙登極後，南懷仁繼續了湯若望的職位。不久便很得康熙的信任。他要學習西洋科學，便請

南氏做他的老師。五個月中，差不多天天要召見南氏，往往整天把他留着。南氏見康熙孜孜向學，尤其是對於天象一門，便像順治時代的湯若望一樣，心裏想『既然古代的那一顆異星，曾經引導過東方的三個「哲王」去朝拜真天主，那麼，這位遠東皇帝，也許要因着認識了星辰，被引到認識和欽崇那「衆星之主」』。那時候南氏是這樣希望着，但是他的希望，也和湯氏一般，沒有實現（註十二）。

因着一六八年八月七日法王魯意十四世正式派遣的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到了北京，中國天主教更得到了一個新推動。他們不但要像比他們先來的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籍的同會教士們一樣，進行傳教工作，也要使西方人對於中國，因着他學術上的貢獻，和與法國新成立的科學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往來，更有較好的認識；還要與地學家、語學家，及和平使者資格，給中國朝廷効力。這一次來華的教士們，是洪若翰（Fonteney）、李明（Le Comte）、白晉（Bouvet）、張誠（Gerbillon）、劉應（Visdelons）。後來又到了馬若瑟（Prémare）、雷孝思（Régis）、巴多明（Parrenin）、蔣友仁（Benoist）、宋君榮（Gaubil）、馮秉正（de Mailla）、錢德明（Amiot）等許多人（註十三）。

在朝的耶穌會士們，雖則有成功的現象，却沒有做到使皇帝歸化。然而他們對於在中國各省

傳教的教士們，的確是一個絕大的奧援。湯南兩氏在朝傳佈福音的功績，要比任何在野的教士們大得多。一六五七年順治帝所以准許一般的宗教解放，便是因為他心目中看重了湯氏的緣故。一六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康熙帝所以下了一道詔諭，保護全國的教堂，許人民自由信仰——這件事是耶穌會士左右康熙能力到了最高點的表现——大概也是爲了重視南氏和他同會修士們學術的緣故。

(註一) 利瑪竇二冊，一三五、一七〇、一九九頁。那時耶穌會遠東會長范禮安 (Valignani) 的意見也是如此，見利瑪竇一冊二八〇頁。

(註二) 全上，一七〇、一九九、二一六、二二五頁。

(註三) 全上，二二三頁。參閱全上，二二五、二四二頁。

(註四) 全上，一冊，二五九、二六四頁；二冊，一七六頁，一八五至一八六頁，又二一〇至三一頁。

(註五) 全上，二冊，一七六頁。

(註六) 全上，二一頁。

(註七)全上，一冊，三六八頁。參閱全上三八九頁；又二冊三六四、三六六、三七二、三七七、三八一頁。

(註八)全上，一冊，四九八頁；二冊，三七六頁。

(註九)全上，一冊，四八四至四八六頁。

(註十)這兩封信譯成了英文在輔仁大學學誌（一九二六年二五至二七頁）發表。原文見東方雜誌（一九一一年六月，

一六至一八頁，並影印版）由高勞註釋。又見聖心報，一九一一年，二一四至二一六頁，二二六至二三八頁。

(註十一)見耶穌會司鐸聶仲遜 (Grealon, S. J.) 手書，藏巴黎國家圖書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卷一四六

八八號。參閱紐約出版之公教通典，揚普著論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New York, Art School.)

(註十二)參閱紐約公教通典 南懷仁 論 (Art. Verbiest)

(註十三)參閱通報 一九一六年，二七二等頁。

十一 內外交迫的艱難

凡是爲天主的工作，沒有一件不是先受磨難，然後成功的。中國的傳教事業，對於這天主上智的常律，也當然不在例外。那位開創人利瑪竇死了只有六年，便於一六一六年，在南京起了劇烈的教難。這次教難的主動人，是禮部侍郎沈讜。好幾個傳教士被押送澳門，有的還被關在囚籠裏，押解前往。其他潛留在內地的教士們，都藏匿在奉教的中國人家裏，秘密地繼續做着他們的傳教工作。到了一六二二年前，又起了一次教難。一六六四年的教難，鬧得更兇了。這回惡風波的緣由，是因回曆士楊光先忌妬湯若望蒙順治帝寵遇，做了欽天監監正，早就想把他陷害，就後來趁着康熙帝「冲齡踐祚」，輔政大臣鰲拜等不喜西士的機會，便誣告湯若望和各省傳教士陰謀不軌。輔政大臣們聽信了楊光先的話就命禮部會審。結果湯若望幾遭極刑。同時教士們被拘押送廣州的，有二十五人，其他的教士們，又躲起來，等避過了風潮，再去工作。

那時候，教士們的組織變更了。差不多五十年來，在中國傳教的，只有耶穌會士。到了一六三一年上，纔有多敏我會士接踵來華。一六三三年，方濟各會士也來了。後來其他修會團體又來了幾位。像奧斯定會，是於一六八〇年來的，巴黎外方傳教會，是於一六八三年來的。教士們來的愈多，歸化的信衆，果然增加不少，可是困難也就因此加多了。非耶穌會教士們一到了中國之後，敵人們便從中挑撥，設法搗亂。因此在一六三四至一六三五年間，各派傳教士中，便發生了那最不幸的禮儀上的爭執，彼此都公然爭持着（註一）。關於中國人對天主的名稱，祭祖宗，拜孔子等事，爭論過不知道有多少次數。教士們都分作兩派，彼此都竭力爭持着，而且完全自信地、熱烈地、不屈不撓地和有些近乎固執地，爭持着。他們又不是完全沒有黨見的，而且還有是感情用事，更帶着他種過於是人類本性的色彩。教士們分了黨派，當然信友們也不免要分着黨派。到了一百多年後，這個不幸的爭端，經教宗本篤十四世，於一七四二年，七月十一日（註二），親自審核，切實解決以後，那惟我獨尊的中國皇帝（註三），已因着眼見一個國外的威權來干涉中國的內務，便覺着大大的不樂意了。從這裏到教難，和傳教事業的毀敗，相去的距離，已是不遠了（註四）。

可是我們如果定要追究上述事件的經過事實，來尋求那跟在上述時期後面，可悲悼的危機的充分緣由，那是大可不必，而且在歷史上未免要有不盡不實啦。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上半世紀中，傳教工作上，所有的敵視行爲，和許多隔閡，原因不止一種咧。康熙時代的教難，不全是因爲教士們意見不和而起的。在雍正的眼裏，便是宗室大臣，也不能邀他的恩赦。一七二三，至一七二七年間，一個近支宗室，職居將軍的蘇努，因爲信奉了天主教，全家被戍到極邊，其中有封爵的男子有三十七人，婦女人數也相彷彿，僕役三百餘名，大多數也已奉教（註五）。事實上，康熙以後的滿清君主，雖則依舊重視教士們的學術，却已痛恨着他們的宗教。各省地方官員，也明知皇上已變了主意，纔敢大膽肆行壓迫。此外教士們，既然大抵是外國人，自然也像目前一樣，很容易被誣爲外國政府的工具。

在這些情形以外，關於耶穌會方面，還該加上他們在歐洲的仇敵變得越弄越多，終至耶穌會被追解散一層。先解散當地的耶穌會，隨後於一七七三年完全解散。中國也和其他各國一樣因着耶穌會的解散而感覺着深刻的痛苦，或者比別國還要深刻。他們爲了傳佈天主教的神國，在中國

努力工作了一百九十年。(一五八三——一七七三)這回受了這樣重大的打擊，自利瑪竇以下，多至四百七十二個耶穌會士的工作，差不多完全毀滅。這四百多人中，很有幾個是著名的學者，和工作不憚勞苦的人。所有因着該會解散而發生的種種弊害，他們的後繼人，也不能一一補救(六註)。

我們把上述的緣由，和其他有連帶關係的各種緣由，併在一起，便可以約略明白，爲甚麼在一七〇〇至一八四二的一百四十多年中，天主教在中國會變得「奄奄一息，不絕如縷了」。然而雖則經過了這許多的憂患，和最嚴重的事變，有時信友人數的確也會減少，可是傳教工作，却從未會間斷過。在一七〇〇年上，中國天主教信友有三十萬人。到了一八〇〇年却只有二十萬(註七)。將近十九世紀的中葉，又稍爲超過了三十萬。天主教在中國，經過了一個半世紀長時期嚴厲的教難，和最難堪的艱苦，却至少能保持着她的子女數目。這的確可算得是一種真實的勝利。

(註一)利瑪竇去世後，耶穌會內部便立起紛爭，反對利氏主張的一派的首領，便是繼利氏任會長的龍華民。龍氏會上書傳信部表白他的意見，見那伐來德氏(Navarrete)的 *Tratados Historicos* 一六七六年馬特里(Madrid)印

行，二四六至二八九頁。原書由西雷主教(Mar. de Oré)譯成法文定名 *Traité sur quelques points de la*

Religion des Chinois par le R. P. Longobardi) 一七〇一年(2)巴黎出版。

(註二)我們以為關於這一件事所有屬於歷史方面的寫作，似乎要算公教神學通典(Dictionnaire de Théologie Catholique)中的記述是最好的了。(見二集中國禮儀(Chinois Rites)二二六四至二二九一行)。

(註三)康熙帝對於這事的震怒，我們看了他的一篇諭旨，便可窺見一斑。見「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印影本敘錄」中十四種文件，這本彙輯是由著名的陳垣氏，於一九二五至一九三〇年間，在禁中搜集彙輯，於一九三一年影印的。其中有幾件，是康熙帝的親筆硃諭，也有經他硃筆校閱，圈點的。

(註四)陳氏彙輯的「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中，最後一件便是教宗格肋孟第十一(Clement XI)於一七一五年三月十九日頒佈的禁約。康熙在這禁約後，硃筆加批，「覽此告示，只說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况西洋人等無一人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告示，竟與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彼此亂言者莫過如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等語。

(註五)關於蘇努一家被難的情形，可參閱巴多明(Parrenin)先後的函牘，見 Letres Edifiantes XVI-XVIII 又 司克徒倫(Stocklein)氏的 Walboott 二九一號。又一七三九年刊印的 Herrliche Tugend-Beispiel 一書，也

記載着這回事，却不免稍有錯誤。（參閱通報一九三二年，一〇八頁註一）陳垣氏也寫了一篇「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在輔仁大學學誌裏發表。（三集，第二號一至三六頁）這篇文字，也出版了。但陳氏對於蘇氏一家被流原因的意見，是由於宗教否，或是政治否（或是宗教和政治二者否）這一層，作者未敢苟同。

（註六）參閱高田氏：「耶穌會的教抑和北京的傳教區」（*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ékin*）見通報一九一六年，二七一至三四七頁，五六一至六二三頁。

（註七）參閱通報一九二〇至二二一年一二三頁。

十一 轉機

這樣的事態，直到十九世紀的中葉，才告終止。那時候，中國外交上，和國際的關係變更了，傳佈福音的方法，也因之而改變。事實上因着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的「南京條約」成立，這海禁森嚴的中國，終於開放了門戶，和世界交通。天主教教會趁着這個新局面，好像一朝「出離幽冥，重覩青天。」此後，各種的條約——先和法國訂約，後來又逐漸和各國訂約，便做了天主教自由傳佈的保障。

一八五八年的和法國訂立的天津條約裏邊，有「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以後其他各國和中國簽訂的條約，都有約定自由傳佈，和信仰天主教的專條。在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條約裏，約定「天下黎民任各處軍民人等傳習天主教會合講道建堂禮拜且將濫行查拏者予以應得處分。」

這樣，中國的天主教，在此後五六十年中，大概要靠着上述各種條約的條款，和一八六五年，及一八九五年，關於在內地購置田產，房屋，臨時增補的協定文件，生存着。

十三 逐漸擴大

國際條約打開了新局面以後，傳教士們便漸漸深入中國內地，創立了新住院，開辦了許多在條約時代以前所不能興辦的事業，又把已辦的，擴大推廣。所有在教難時代，被政府沒收的教會財產，發還的發還，賠償的賠償。便是那從前查禁天主教的詔諭，此刻都已正式取消了。一八七〇年頒發的大清新刑律中禁止天主教的條款，也都正式註銷。

將近十九世紀中葉，在中國工作的傳教會，共計有五個。西班牙多敏我會士（Spanish Dominicans）在福建傳教。巴黎外方傳教會（Paris Foreign Mission Society）所管轄的區域，算是最大了。他們管着四川、貴州、雲南、兩廣、滿洲、和西藏。方濟各會士（Franciscans）們正在中國中部和東部努力工作着，就是山東、山西、陝西、湖北、湖南、五省。遣使會（ Lazarists）的教士們，自從一七八五年，因着耶穌會解散，接管了他們所開創的傳教區以後，却能在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開

始，教難最劇烈時代，不畏艱苦，殫心竭力，來保存河北、江西、河南、浙江等省，信友們的信德，替聖教會出力不少。此外，耶穌會於一七七三年解散，到了一八一四年上，一經恢復以後，便於一八四二年捲土重來，先後分派得江蘇、安徽兩省，和河北的東南部。一八四七年，他們在上海徐家匯徐光啓墓址附近，創立了總部。

十九世紀的下半世紀中，更有他種修會到中國來傳教。密良 (Meig) 外方傳教會士們，是於一八五八年初次到了香港 (註一)。到了一八六九年中，便分經他們河南教區 (註二)。聖母聖心會司鐸們 (The Schent Fathers) 在他們的修會成立了不多時以後，便於一八六五年來華。他們所分得的傳教區，是蒙古，這是傳教工作最難着手的區域中之一 (註三)。奧斯定會傳教士，經過了一百多年的間斷之後，又於一八七九年，回到了河南。一八八五年，羅馬創立了聖伯多祿聖保祿修會 (Roman Seminary of SS. Peter and Paul) 便在這一年的上，派遣會士來華到陝西傳教。德國司帶爾聖言會 (Seyl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註四) 的司鐸們，於一八七九年初次來華，到了一八八二年上，便劃分得山東的一部。此外還有一八八三年來華，住在河北楊家坪的苦修會

士們，(Trappists) (註五) 一八七〇年到香港的教學修士們 (Brothers of the Christian School) 和一八九三年到上海的聖母小昆仲會修士們 (註六)，在中國參加傳教工作。

這些先後來華的傳教會，因着條約的關係，所以在以前做過的傳教外，和照顧信衆的工作之外，還能做着許多新工作，如創辦醫院、孤兒院、留養院等，尤其是各種學校，不但爲培植神職班的神學院，却還開設着各級普通學校，不但爲教育教中子女却也給教外人家的子女們，進德修學的便利。而且那時女修會的女修們，也開始來華，教士們在教育一方面，得到了她們很大的助力。這些女修會中，最先來華的，要算一八四二年來的仁愛會修女們了 (註七)。隨後，來華的有沙德聖保羅女修會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一八四八) 有加諾薩女修會 (Canoisian Sisters) (一八六〇) 有拯亡會 (Helpers of the Holy Souls) (一八六七) 有包底歐上智會 (Portieux Sisters of Providence) (一八七五) 有方濟各聖母傳教會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of Mary) (一八八六) 有多敏我女修會 (Dominican Sisters) (一八八九)。自從一八六九年，聖衣會修女們到了上海之後，歐洲婦女們的隱修會，竟也陸續在中國設立分會了。

一八五〇至一九〇〇年間的五十年中，除了太平天國的擾亂，天津教案和義和團之亂，以及其他大小事變以外，天主教在中國的教務情形，大致還算平順。可是一八五〇至一八六九年間的十九年中，司鐸們被殺的有十五人，信友們被殺失蹤，或是被拘禁的，有數百人。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十位仁愛會修女，兩位司鐸，和幾個信友們在天津被殘殺。一八七一至一八九九年的二十八年中，教士們被害的又有十人。這幾起殺害教士案件，有幾件釀成了重大國際交涉，使中國遭受了很大的不利。一千九百年，拳匪之亂，教士們被殺害的，計有主教五人，外籍司鐸二十九人，外籍修女九人，修士三人。信友們被殺害的，約計有二三萬人（註八）。他們列入真福品的請求，現正準備向羅馬聖部提出。

如今於中國的諸位致命，經羅馬天主教會列入真福品的，已有三十三人。其中十九位，是於一八八九，一八九三，和一九〇〇年先後由教宗良十三世欽定的，其餘十四位，是由教宗庇護十世於一九〇九年欽定的。這三十三位致命真福中，有三位外籍主教，九位外籍，四位國籍，司鐸。還有兩位修院生，八位要理教習，三位信友，兩位貞女，和兩位寡婦，都是國籍。他們捨身致命的地方，是在

福建、貴州、四川、湖南、湖北、和廣西；時期是在一六四八至一八六二年間（註九）。

（註一）見德馬養氏（J. de Moidrey, S. J.）「中國高麗和日本的天主教主教區」*La Hiérarchie Catholique en Chine, en Corée et au Japon* 一九一四年上海出版，二〇二頁。

（註二）參閱眞福和德連六百週紀念刊一冊（*VI Centenario del B. Odorico da Fordenone*）一一四頁。

（註三）參閱廣登氏（Rutten）聖母聖心會傳教士和他們的會祖（*Les Missionnaires de Schent et leur Fondateur*）一九三〇年，六三至九一頁。

（註四）參閱包士傑氏（Planchet）中國和日本的傳教區（*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一九一九年，四一
二至四一五頁。

（註五）參閱于純璧氏（Hubrecht）中國苦修院的原始（*Les Origines de la Trappe de Chine*）見 *OCS* 一九三
三年三二四至三二七頁。

（註六）非天主教的讀者，宜注意此等傳教會，都是天主教各種修會，並不是像聖公會、長老會等，各樹一幟，不相統屬的。天主教內傳教會不過是修會團體，都在唯一的天主教教教會以內。

(註七)參閱包士傑氏：中國和日本的傳教區一九一六年，三四至三六頁。

(註八)從一三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止，所有在中國被害的外籍教士，曾由包士傑氏製表詳列，見全上，一九二三年，五二一至五四〇頁。又一九二五年，六一二至六一三頁。可是在聖母聖心會雜誌 (*Missions de Schené*) 上一九二四年五六至六二頁中，我們可以見到自一八一五至一九二三年間，被害的外籍教士們，更正確的表格。

(註九)關於這三十三位中國致命真福各位的事蹟我們可以就 *Boletim Eclesiastico da Diocese de Macan, 1933* XXX, pp. 763-768, 844-858, 893-900; XXXI, pp. 6-19 見到很有歷史價值的記載。

十四 二十世紀的中國天主教

自從多利亞（Tertullian）時代，直到如今，「致命聖人們的義血，却做了天主教信友們的種子。」這句古老話，對於中國，不但不會有過例外，而且中國却更「出色當行」地，證明了他的真實。

中國天主教在這二十世紀的三十三年中，雖則經過了最厲害的阻力，却依舊很興旺地，而且更出人意料地，發展着。這三十三年中「喪亂頻仍，危機四伏，」聖教所遭的艱難，如拳亂時的重大損失，國內政局的屢屢變化，一九一一年的一「辛亥」革命，接着又是世界大戰，民國成立後，又是內戰不絕，管符遍地，共產主義蔓延，教士們被擄勒贖，或橫遭戕害，可是教務却仍有神奇的收穫。

中國天主教信友人數，一九〇〇年是七十四萬一千五百六十二。一九〇七年，初次達到一百萬的標記。一九一〇年增加到一百二十九萬二千二百八十七；一九二〇年，增加到一百九十九萬

四千四百八十三。一九二一年約略超過二百萬（確實數目是二百零五萬六千三百三十八）。一九三〇年，有二百四十九萬八千零十五；一九三二年，有二百五十六萬二千七百四十二。可知從一九〇〇年起，天主教信友人數在十三年中增加了一倍（一九一四年是一百五十一萬九千）；二十三年中增加了兩倍（一九二三年是二百二十三萬三千）；三十二年中差不多是四倍（一九三二年是二百五十六萬二千七百四十二）。可是一九〇〇年以前，要過三十多年纔得增加一倍（一八七〇年的數目是三十六萬九千四百四十一。一九〇〇年的是七十四萬一千五百六十二）。

神職班的增加，也一樣使人欣慰。在一九〇〇年上，中國全境的傳教區，由十個傳教會分別擔任，就是奧斯定會、多敏我會、方濟各會、耶穌會、遣使會、聖言會、聖母聖心會，以及巴黎、密良和羅馬三處的外方傳教會。但是一九〇〇年以後，其他的傳教會士相繼來華，絡繹不絕。各省修會林立，教士們加緊工作，從沒有見過這樣的盛況。許多修會團體因着教宗本篤十五世，一九一九年間頒佈了 *Maximum Illud* 通牒，鼓勵傳教事業；人稱「傳教教宗」的當今教宗庇護十一世，又一再昭告多方激勵，尤其是他一九二六年所頒的 *Rerum Ecclesiae* 通牒，說得十分懇切。因此歐洲各修

會，陸續派遣會士來華，努力參加工作。

所以在上述外籍，或是國籍，神職班的傳教會士，和會內的會外神職班以外，又陸續加入了其他的傳教人員。比方慈幼會士們 (The Salesians) 是於一九〇二年到了澳門；巴爾瑪 外方傳教會士們，(The Parma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是於一九〇四年到了河南；伊蘇登 外方傳教會士們 (Issondum Fathers) 是於一九一七年到了貴陽；瑪利諾 外方傳教會士們 (The Martyknoll F. M. Society) 是於一九一八年到了廣州江門；聖高隆龐 (St. Columban) 外方傳教會士們是於一九二〇年到了漢陽；苦難會士們 (The Passionists) 是於一九二一年到了湖南辰州；比布斯 (Picpus) 二心會士們 是於一九二二年到了瓊州；聖心司鐸會 (Beharramites) 是於同年到了雲南大理。此外如本篤會 (Benedictine) 士們先後分三次來華；美國本雪爾凡尼 (Pensylvanica) 的本篤會士們 是於一九二五年到了北平；洛本 (Lophem) 的，於一九二六年到了四川西山；聖奧迪爾的 (S. t. Odele) 於一九二八年到了吉林延吉。一九二三年救世主會士們 (The Salvatorians) 到了福建邵武；一九二五年，印五傷司鐸會士們 (Stigmatics) 到了河北易縣；司格包羅勃塔夫

(Scarboro Bluff) 外方傳教會士們到了浙江處州；開倍克 (Quebec) 外方傳教會士們到了遼寧四平街；一九二六年，方濟各特規會士們 (Conventuals) 到了陝西興安；白冷 (Bethlehem) 外方傳教會士們到了黑龍江齊齊哈爾；一九二八年，奧斯定重整會士們 (Recollects) 到了河南歸德；贖世主會士們 (Redemptorists) 到了河南駐馬店；一九三三年，奧斯定常律會士們 (Canons Regular) 到了西藏；聖母心子會士們 (The Missionary Sons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到了安徽徽州。

這些來華的外籍傳教士們，都是從世界各國，歐美各方，不遠萬里而來。在毫無成見的中國人眼裏看來，足見天主教的普遍性，是絕無「畛域之見」的他們的。國籍，各國都有，不論南美、北美、澳洲、奧大利、比利時、加拿大、捷克、荷蘭、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匈牙利、愛爾蘭、意大利、巨哥斯洛伐、基波蘭、葡萄牙、西班牙、瑞士甚麼都有。他們的人數，一九〇〇年，有八百八十六；一九一〇年，有一千三百九十一；一九二〇年，有一千三百六十四；一九三〇年，有二千〇六十八。這幾年份的宗座代牧，或是監牧，還不計入，數目是四十一，四十七，五十四，六十九（註二）。外籍神職班的情形大致如此。

中國人自己也創立了兩個男修會：一個是一九二八年在安國成立的，定名「聖若翰保第斯大小兄弟會」；一個是一九三〇年在宣化成立的，定名「主徒會」。

最近幾十年內，各國女修會，因為在醫藥界有極好服務機會，尤其是因為中國在廢除舊式教育以後，亟需學校教育的工作人員，便把職任傳教的修女們，陸續派到中國，設立分會。因此除了前述十九世紀中來華的修女們以外，又有許多女修會的修女們絡繹來華。如上海的安老會修女們（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是於一九〇四年來的；山東兗州的司帶爾聖神忠僕會修女們（The Servants of the Holy Ghost）是於一九〇五年來的；加拿大烏忒蒙（Ouremont）的始孕無玷會（The Missionary Sisters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of Canada）於一九〇九年到了廣州；埃及方濟各女修會（The Franciscan Missionary Sisters of Egypt）（註二）於一九一〇年，到了湖北老河口；美國瑪利諾多敏我外方傳教會的修女們（The Mary Knoll Foreign Mission Sisters of St. Dominic）於一九二〇年，到了香港；山林聖瑪利亞（St. Mary-of-the-woods）上智會修女們（The Sisters of Providence）於同年，到了河南開封；包勒杜（Bois-

le-due 瑪利亞若瑟女兒們 (Daughters of Mary and Joseph) 於一九二二年到了熱河；勒奴維爾 (Lennoxville) 天神母后會的修女們 (Sisters of Notre Dame des Anges) 於同年到了貴州貴陽；聖若瑟小姊妹會修女們 (The Little Sisters of St. Joseph) 到了山西潞安；羅馬的聖烏蘇拉 (St. Ursula) 羅馬聯合會 (St Roman Union) 也於那年到了廣東汕頭；南林 (Nerinx) 勞萊篤修女們 (Sisters of Loreto at the foot of the Cross) 於一九二三年到了漢陽；尼開蒙弗拉篤 (Nizza Monferrato) 的進教久佑會修女們 (Daughters of Mary Auxiliatrix) 於同年到了廣東韶州；魯文 (Louvain) 奧斯定會傳教修女們 (Missionary Canon Nuns of St. Augustin) 也於同年到了甯夏；加拿大寶血會修女們 (The Adorer Sisters of the Precious Blood) 於一九二四年到了河北獻縣；洛勞諾 (Logrono) 奧斯定第二會教學修女們 (The Teaching Sisters of the Third Order of St. Augustin) 於一九二五年到了湖南常德；孔蕙 (Convent Station N. J.) 仁愛會修女們 (Sisters of Charity) 於同年到了湖南辰州；斯不林飛耳 (Springfield) 方濟各會服務醫院的修女們 (The Hospital Sisters of St. Francis) 也於同年到了山東濟南。一九二六年，加

依根 (Cahircon) 聖高隆龐會傳教修女們 (The Missionary Sisters of St. Columban) 到了湖
北漢陽；美國畢資堡 (Pitts) 聖若瑟會修女們 (Sisters of St. Joseph) 到了湖南辰州；貝來 (Borry)
聖母贖擄會傳教修女們 (Missionary Sisters of Keray) 到了安徽蕪湖；匈牙利加羅薩聖母會
(Sisters of Our Lady of Kaloka) 教學修女們到了河北獻縣；耶穌聖心會到了上海，聖心會修
女們 (Religious Sisters of the Sacred Heart) 到了浙江嘉興；救世主會修女們 (Salvatorian)
到了福建邵武。一九二七年，巴爾瑪烏蘇拉聖心會修女們 (Ursuline Sisters of the Sacred Heart
of Barma) 到了安徽蚌埠，盧林堡 (Luxemburg) 方濟各第三會仁愛會修女們 (Sisters of
Mercy) 到了湖南永州。一九二八年，奧斯定重整會修女們 (The Recollect Sisters of St.
Augustine) 到了河南歸德。拉克勞司 (La Crosse) 卒世朝拜方濟各會修女們 (Franciscan Sisters
of Perpetual Adoration) 到了湖北武昌。一九二九年，美國沃海窪州若瑟山 (Mount St. Jo-
seph, Ohio) 仁愛會修女們到了武昌；英琴波 (Ingenbols) 聖十字架修女們 (Sisters of
the Holy Cross) 到了黑龍江齊齊哈爾；巴伐利亞 (Bavaria) 聖方濟各沙拉諾修女們

(Sisters of St. Francis-Salano) 到了山西朔州；奈繆聖母修女會修女們 (Sisters of Notre Dame de Namur) 到了武昌；一九三〇年，美國本篤會修女們 到了北平；嘉布遣會第三會，聖家女修會修女們 (The Third Order Capuchin Nuns of the Holy Family) 到了甘肅平涼。一九三一年，門斯德 (Minster) 始孕無玷會修女們，到了山東濟南；耶穌孝女會修女們 (Daughters of Jeansis) 到了安慶；一九三三年，善牧會修女們 (Sisters of the Goodhep) 到了上海。

假使我們願意把這些修女會們所做的事業，略為考察一下，我們可以說在一九三〇年那一年上，中國境內，共有四十八個外籍女修會修女人數，是二千四百六十人，外籍九百十六人，國籍一千五百四十四人。這一年裏，委託修女們料理的醫院，或是留養院等，共有二百三十二所，所照顧的病人，計八萬〇一百四十二人。老人，計五千五百六十二人。所有施診所也大概由她們經營，擔任這種職務的修女，計七百八十五所，一九三〇年一年中施診給藥，共有七百零六萬一千四百九十二起。同年，她們因着會外貞女們的襄助聖嬰會的孩子們由她們照管的，有五萬二千八百九十四人。又三百六十處的孤兒院中，由她們養育的孤兒，有二萬一千八百五十八人。講到教育，自從中國於

一九〇四年廢除科舉，與辦學校之後，果然因此發展加速了，可是並不是因此才發動的。利瑪竇時代最初的努力，姑且不說，一八四七年耶穌會在上海徐家匯創立。只過了三年，那遐邇聞名，素稱教育中心的徐匯公學，早就於一八五〇年開辦了。學生們不論教內教外，都得入學肄業。」

二十世紀中，天主教開辦的各級學校，更是日盛月增，上自各科大學，和栽植神職班的大小修院，下至教理小學，多得不可勝計。除了北平、大同、濟南、兗州、成都、徐家匯、開封、宣化、漢口、九江、甯波、香港，各區所設立的十二處中樞修院外，許多宗座代牧區，或是宗座監牧區，還另外設立着一兩個修院。一九三〇年這一年內，共計攻習拉丁文的學生，有四千三百五十一名，攻習哲學的，有三百二十七名，攻習神學的，有四百二十五名。此外還有二十九名修院生，在羅馬留學，預備晉陞司鐸。

爲便利學生們求高深學問起見，法國耶穌會士們在上海設立着震旦大學。這個大學是在一九〇三年開辦的，由耶穌會管理。在北平，則有輔仁大學，是於一九二五年，由美國本篤會士們創辦的，一九三三年，讓渡給聖言會司鐸們管轄。法國耶穌會又於一九二二年在天津創辦了工商學院。震旦、輔仁兩大學和工商學院，都已呈准政府立案。一九三〇年，三大學學生，共計一千三百八十四

名，都是男生；分別計算，正科生：教內，一百四十三名，教外，三百七十九名，預科生：教內，一百五十六名，教外，六百九十六名。

在許多教區內，還設立着高等學校，教授初高中課程。一九三〇年這種學校共計有五十一所，男生八千三百〇六名，教內，三千四百三十三名，教外，四千八百七十三名。又女生四千〇二十六名，教內，一千九百九十五名，教外，二千〇三十一名。

同年份，肄業各屬師範學校，預備將來從事於教育工作的男生，有二百七十九名，女生，三百九十五名。又其他各屬造就要理教員的學校裏，有青年男子八百七十七名，青年女子七百五十四名。尋常男女兒童，都在初高小受教育。一九三〇年，共有男童高小學校，一百九十七所，計教內生六千零五十六名，教外生四千三百三十三名；女童高小學校，一百十七所，計教內生三千九百三十六名，教外生四千四百五十一名。此外，教理學校有八千六百四十所，男生八萬六千九百七十五名，女生七萬五千五百十名（註三）。

講起教育工作，不妨順便在這裏提一提中國天主教教會出版的刊物。各種定期刊物如週刊

月刊、半月刊等，約有三十種，中西文都有。西文刊物有辣丁文、有英、法文、也有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各國文字。同時公教教會，也辦着印刷事業，他們經營的印刷所，有二十餘處，主要的，是北平、天津、上海、土山灣、獻縣、者慶、兗州、香港七處，這幾處的印書館，辦得很久，先後出版的書報刊物，不下數十萬種。第一，要算土山灣印書館的出品最多，竟多到五十三萬種。其次是重慶的聖家印書局，也有四十萬種。這些書籍的作重，如南京會外神職班的黃伯祿和耶穌會士晁德蒞（Zatoli），夏鳴雷（Havret），顧養芬（Couvrier），管宜穆（Tobar），夏之時（Richard），祿是適（Doré），戴遂良（Weiger）等，都是教中著名的華文學家。還有其他非耶穌會士的華文學家如樊國樑（Mgr. Favier），陶福晉（Mgr. Otto），貝廉（Perry），歐馨石（Aubazac），樑司鐸（Lamasse），雷慕賢（Rey），閔司鐸（Jasmin），閔神父（Mullie），任司鐸（Maorio），鮑司鐸（Biallas），苗司鐸（Mittler），于純璧（Hubrecht）等多得難以計數。

為依照上海第一次全國公會會議決議鼓勵發展，和統一天主教教育和印刷業務起見，一九二八年在北平設立了一個中樞機關，由宗座駐華代表直接監督。這個幾關的名稱是「中華公教教

育聯合會，」這個教育委員會除了其他解多出版物以外，還發行着一種月刊，用華文、辣丁文和英文，四種文字刊印這種雜誌，華名稱「中華公教教育聯合會叢刊」，英文名稱是：「The Digest of the Synodal Commission」。

(註一)查一九三二年亞洲全境外籍教士，只有四千零五十八人，在中國的已佔半數。

(註二)包士傑氏「中國和日本的天主教教務」一九一九年版，西一五至四一六頁。

(註三)一九〇一至一九二二年間所有關於中國天主教教務可靠統計，詳見徐家匯天文台年報 (Annuaire de l'Observatoire de Zikawei 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二年見玉山山灣出版之「中國天主教傳教教務修院及附屬各機關」 (Missions Seminaires Oeuvres Catholique, en Chine) 一九三三年以後，可閱玉山山灣出版之「中國天主教教務年報」 (Annuaire des Missions Catholique en Chine) 耶穌會馬德賽司鐸 (Fr. de Moitrey, S.J. 在他所著的 Notes sur les vingtquatre dernières Années de 5 Régions Synodales de Chine (一九三〇年玉山山灣出版) 一書中，對於一九〇三至一九二七年間所有中國天主教信友人數，中外神職班，大小修院，及男女修士等，亦有詳細記載，和圖表等，可供參攷。

十五 中華本國教會的盛興

天主教傳入中國的當初，傳教士們就有一種明白的觀念，要使中國的天主教會，漸漸失去由外人引入，和由外人管理的傳教工作的性質，成功一個有規則的、通常的、當地的、本籍的教會，完全由中華民族的子女們，組織成立，行使各級神職人員的職務，從尋常的司鐸，直到主教，從女修會中的小姊妹，直到會長。聖教會也向懷着這個國籍教會的期望：『讓中國人爲耶穌精神地而感化中國。』她要在中國有一個根長在中國泥土裏的教會。

假使我們約略看一看天主教中所有有根據的各項文件，便可以知道歷代教宗們永久不變的政策，總在督促造成中國國籍神職班，和建立中國國籍主教。一六六九年，教宗格肋孟九世，和一六七三年，教宗格肋孟十世，先後宣稱他派遣宗座代牧到中國，大概是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就是：要造成國籍神職班，和建立國籍主教。十八世紀中歷任教宗們，都曾一再聲言，凡在傳教地方，傳佈建

設天主教教會的必要方法，是在發展本籍司鐸，和本籍主教。一八四五年間，羅馬教廷會規定一種原則，就是：培養本籍神職班，應該使他們適合於教會全部的職任，連主教包括在內。一八九三年，教宗良十三世，曾頒諭旨，說『要是沒有國籍神職班，和國籍主教，那麼，教外國中的天主教信仰，不會有確定的將來。』一九一九年，教宗本篤十五世，說明『天主教既然不分畛域，那麼，每一個國家，應該培養自己的神聖職班。』他又道：『凡有本籍神職班的地方，有充分人數和充分訓練，這一處的傳教工作，必然要認爲已經達得了可喜的終向，那裏的教會是成立了。』最後，教宗庇護十一世更於一九二六年間，堅持着說：『耶穌神國，假使沒有本籍神職班做基礎，到處不能成立，也不能有穩固的進展。』

至於這種傳教計劃的實現，中華國籍神職班的歷史，很可以分做三個時期：就是開始時期（一二九四——一八四四）長成時期（一八四四——一九二六）和加冠時期（一九二六年以後）（註一）。

喬伐尼蒙高味諾曾把小四品委給高唐王。前面說過，他又收錄了四十個青年，親自教他們辣

丁文和聖教禮儀，更爲他們繙釋新經和聖咏，還想把日課經全部譯出，雖則種種設備很是簡陋，這種舉動，却足以表示這位第一先驅，便在十三世紀將告終的時候，對於這個本籍神職班的大問題，也未始不關心。

利瑪竇來華後，只過了六年，便已提及最先的兩個中國人，渴盼着進修會。兩年以後，就是在一五九一年的開始時候，耶穌會遠東會長范禮安就收了這兩個人進耶穌會。這兩位修士，一名鍾鳴仁，一名黃明沙。葡文名字第一弗那台(Fernandes)第二瑪底諾(Martinez)。黃明沙還領過小四品，預備晉鐸。除了鍾黃兩人以外，利氏親收入會的青年華人，多到有六個，其他預備進會的，還有好幾個。一六〇五年，利氏記着道：『在我們各處的住院中，除了本會會士以外，還有其他許多的學生們，都是生長在中國的，他們正預備着要進耶穌會。』一五八三至一七八〇年間，在中國傳教的四百七十二名耶穌會士中，八十一名是華籍，其中有四十八位司鐸。在四川傳教的巴黎外方傳教會，在一七八一至一八二一年教難最劇烈的四十年間，中國人晉陞司鐸的，多至四十六人。遣使會中西教士的比例，也很可觀：一六九七至一九一一年間，在中國傳教的五百九十三名會士中，有十一

個蒙古人，都是司鐸，一百八十五個中國人，除了八人外，其餘都是司鐸；其中有二人在一九二六年上，又祝聖了主教（註三）。

多敏我會獲有晉陞第一個中國司鐸，後來又祝聖了天主教主教的榮譽。這位主教便是羅文藻（Lopez）（註四）。他於一六一六年在福建羅家莊誕生，一六三四年在利安堂司鐸（Fr. Antonio de Santa Maria O. F. M.）手裏領洗入教；到了一六五〇年上，他進了多敏我會，一六五六年，到小呂宋馬尼刺（Manila）祝聖司鐸。一六七四年，他被任南京宗座代牧，一六八五年，纔由本篤十五世的一個親屬康和之主教（Magr. Bernardino della Chiesa O. F. M.）在廣州祝聖。羅主教在一六八八年八月一日祝聖了三個最先的中國耶穌會司鐸（註五）。一個叫萬其淵，號三泉，那時他已有五十四歲，一個是清代六大畫家之一，吳歷，號漁山，那時他已有五十七歲，還有一個是做過欽天監監副的劉蘊德，號素公，那時他已有六十歲。羅主教到一六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纔在南京去世，葬雨花臺。

自從一八四四年，准許自由傳教，環境一新之後，傳教士們便立即開始工作，收錄中國子弟着

手訓練，來培養本籍神職班，比較百年前的辦法，規模大了許多。雖則不免有種種困難，却差不多每一個宗代牧區，或是宗監牧區，都設立了修院，就其是一九〇〇年以後，設立得更多了。因此，目下中國各省，都有本籍神職班，不過人數多少些罷了。晚近這種神職班，發達得很足使人驚奇。查十八世紀中葉，華籍司鐸只有十五人；十九世紀開始時，也不過三十三人；到南京條約成立時，約有一百三十人。可是這些數目，一八四八年上，增到一百三十五；一八六五年，增到一百五十七；一八八六年，是三百二十；一九〇〇年，是四百七十；一九一〇年，是五百二十一；一九二〇年，是九百六十三；一九三〇年，是一千五百。假使我們注意到一九三一年全世界傳教地內，本籍司鐸人數三千二百三十二中，亞洲就獨佔着三千〇三十八，中國便可以自誇是世界上因着國籍神職班獲得無上榮譽唯一的國家了。一八四二至一九二一年間，在南京區傳教的耶穌會士，五百六十八人中，有一百人是華籍，還有會外司鐸們一百三十八人，不計在內。而且華籍神職班，往往比外籍要超過許多。比方，在一九三二年前，劃分給遣使會的華南七個教區，華籍教士有一百九十六人，外籍的却只有百十五。同年，北平宗代牧區內，外籍神職班只有二十九人，國籍的竟多至九十九人（註六）。未來的狀況，更

要大放光明。一九三二年，在中國，或是在羅馬，預備晉鐸的中國青年，共有八百六十三人，他們都在大修院，或是修會中，攻習神哲學，將屆畢業。同時，志在修道，開始學習辣丁文的初級生，有四千三百五十一人。

國籍神職班中，還該計入修女們。國外來的各種女修會，很有許多，已經收錄了許多中國女子入會。像教士們一樣，國籍會員，也往往超過外籍會員。比方女修會中，最先來華的仁愛會，於一九三二年間，分駐在九個教區內，二十八個住院中的國籍修女，共計有二百十八人；外籍的却只有一百六十三。同年，各屬女修會會員二千六百四十三人中，一千〇二十七是中國人。

但是在這些中外修女像一家姊妹們共同生活着的混合修會以外，如今中華天主教還有近乎四十個女修會，或是善會，會員完全是生長中國的女子們（註七）。最先成立的，便是獻堂會，在一八五五年上就已開始在上海創立了。過了不久，其他的本籍女修會也就接踵興起。一八五八年，吉林創立了聖母聖心會；一八六〇年，香港創立了耶穌寶血會；一八七二年，北京創立了若瑟會；一八八〇年，湖北老河口創立了方濟各第三會；一八八〇年，河北正定創立了若瑟會；一八九二年，浙江

甯波創立了拯靈會；一八九四年，熱河創立了聖母無染原罪會；一八九七年，江西吉安創立了聖婦亞納會；一八九八年，廣州創立了聖母無原罪會。

二十世紀中，這些本籍女修會更如「雨後春筍，滋長勃發。」最近三十年中，幾乎年年有一兩個新會成立。我們不妨用編年體來逐一排列着：一九〇一年創立的是河北永平的聖母會；一九〇三年，是廣西南甯的聖家會；一九〇五年，是宜昌的聖方濟各第三會聖嬰會；一九〇七年，是江西南昌的聖母善導會；一九一〇年，是山東兗州的聖家會和四川重慶的聖心會；一九一三年，是四川敘州的聖道貞女會和奉天的聖母聖心會；一九一四年，是浙江杭州的聖心女兒會；一九一五年，是貴州貴陽的聖心院；一九一七年，是湖北漢口的聖方濟各第三會訓蒙院；一九二〇年，是河南南陽的聖母無原罪會；一九二二年，是陝西西安的耶穌聖心聖方濟各第三修女會，陝西漢中的善道修女會；一九二四年，是山西太原的貞女傳信教授會；一九二六年，是甯夏的聖女嬰孩耶穌德肋撒會；一九二七年，是廣東北海的聖母會和無原罪會；一九二八年，是山東兗州的傳信協助會；一九二九年，是湖北武昌的聖若瑟善功會，陝西漢中的寶血會，山東烟台的聖母傳教會，和河北安國的德來院；

一九三〇年，是蒙古集甯的獻堂修女會；一九三一年，是江蘇海門的小德肋撒會和甘肅蘭州的聖家女修會；一九三二年，是河北獻縣的聖母救亡會和河北永年的聖神修女會；一九三三年是湖南衡州的瑪利亞亞松大聖方濟各第三修女會，和常德的傳教貞女會（註八）。

一九三二年這些，本籍女修會會員共計，有二千零八十五人，再加上前述混合女修會裏的本籍會員，那麼，守貞不字，完全爲聖教會服務的中國女子共計有三千零一人了。

此外，還該加上要理女師，守貞女教習，和在家貞女們。她們都並不加入任何修會。一九三二年前，計有要理女師四千五百六十三人，守貞女教習五千三百九十人，在家貞女七千六百一十一人。

一九二二年，宗座代表到了中國之後，中華國籍主教的計劃，便次第實現。這位宗座代表就職後最先模範之一，便是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和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五日，先後委任兩位國籍司鐸做了宗座監牧。

一九二六年二月間教宗庇護十一世頒佈了“*Retrum Ecclesiae*”，通牒。在這次通牒裏，他重新明白宣示說：「以後不得再藉口任何情事，去阻礙國籍司鐸們做本鐸區，或者竟是本牧區的

首領，要依着天主的聖意，從速創立本籍主教的本牧區。」這最後的幾句話，就是宣告要委任華籍主教了。事實上，這通牒頒佈後不到三個月，消息傳來，華諦岡宮中，已委任了六位華籍主教，其中一位，是屬於會外神職班，兩位是方濟各會士，兩位是遣使會士，一位是耶穌會士。爲要使全世界公教信衆注意這一次歷史的盛舉，明白這回的舉動，在中國天主教史上，闢一新紀元起見，庇護十一世把這幾位新主教召到羅馬，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在華諦岡大堂中，親自祝聖。這樣，便把幾百年來，關於本籍神職班，羅馬的老政策加上了冠冕。一九三三年，這位教宗，趁着舉行吾主耶穌救贖聖功，一千九百週年紀念盛典的機會，又於六月十一日，在羅馬第二次親自祝聖了三位華籍主教。

（註一）關於本籍神職班全部問題，從開始時候，到一九二六年止，所有教理上，和歷史上的見解，一九二七年，土山灣出版的德禮賢中華天主教國籍主教 Paschal M. D. Elia, S. J. : Catholic Native Episcopacy in China一書

中有概括的摘錄。

（註二）利瑪竇二冊，二七四頁。

(註三)見「一六九七年以來傳教中國遣使會的司鐸、修士目錄」(Catalogue des Prêtres, Clercs et Frer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qui ont travaillé en Chine depuis 1699) 北京一九一一年出版。

(註四)參閱「中華國籍主教」三〇至三五頁羅氏小傳。

(註五)這些是在中國最先的耶穌會司鐸，但是還有在他們之先的，一個澳門出身的中國耶穌會士，在一六七一年，或竟還在以前在羅馬祝聖了司鐸，他的名字叫鄭瑪諾，號維信(Sequeira)，他的墓址在北平阜城門外滕公柵欄，有墓碑可以證實他是第一個中國耶穌會司鐸。華籍司鐸羅文藻後，似乎他是第二人了。

(註六) BOP 一九三二年，五一頁。

(註七)這些修善二種會大抵都是只限於所屬主教區內的會，完全由各該教區的教長負責監督。

(註八)參閱「一九三三年中國天主教教務年報」(Annuaire des Missions Catholiques de Chine en 1933) 又

Missions Catholiques cura S. Congregacionis de Propagan da Fide descriptal, 1930, pp. 166-177

一九三〇年，一六六至一七七頁。又見馬德賓氏(J. de Moidrey S. J.)中國女修會(Congrégations et Associations Chinoises de Sœurs 一九三〇年，土山灣印行。前述的未將該女修會的各分會，分別錄出。

十六 現下的組織工作和艱難

中國幅員廣闊，因之傳教區域，也經分疆劃界，界限分明。各屬的教區分爲三種，第一種叫「宗座代牧區」，簡稱「宗代區」，設一主教，管轄全區教務。這位主教，稱爲「宗座代牧」。第二種叫「宗座監牧區」，簡稱「宗監區」，第三種叫「自立傳教區」，簡稱「自立區」。管轄後二種全區教務，是一位沒有主教職銜的司鐸。稱爲「宗座監牧」，或「自立區的區長」。這種辦法，可以免除派在各該教區內教士們種種瑣細的困難，使他們可以在指定區域內，自由發展。直到一九二四年止，各屬教區都是專託修會管理的，包括外方傳教會在內。一九二四年以後，中華會外神職班，也分得了十個宗代區，和六個宗監區。

在十七世紀末葉，而且實在還在條約未成立以前時代，管理全中國各屬教務的主教，或是宗座代牧，只有六位。可是環境一經變遷之後，尤其是自從世界大戰以來，中國的教區一再劃分，平添

了許多新教區。查中國全境傳教區域，一八〇〇年，只有六區；一八四四年，有十區；一八六五年，有二十二區；一九二〇年，有五十二區；一九二六年，有七十六區；一九三〇年，有一百區。一九三三年，有一百二十區。最近十年間，傳教區域，從五十六，（一九二二年）跳到一百十八，（一九三二年）竟加了一倍多。一九三二年間，天主教信友最多的區域，計北平區，有二十六萬五千六百三十一人；南京區，有十四萬九千五百八十六人；河北獻縣區，有十萬零六千八百八十七人。其他的區域，都不到十萬。信友在五萬以上的，只有五區，就是：山東兗州區，（九萬七千三百），河北保定區，（七萬六千二百四十三），河北正定區，（五萬九千一百五十三），江蘇徐州區，（五萬五千五百二十六），和天津區，（五萬一千一百八十九）。四萬以上的有四區，就是山西潞安、浙江甯波、安徽蚌埠、和河北永年。三萬以上的，有河北安國、宣化、和趙縣；四川敘州和重慶；福建福州；江蘇海門；浙江杭州；廣東香港；湖北宜昌，和老河口；江西南昌；蒙古西灣子，和綏遠；山東濟南，和青島；河南衛輝；安徽蕪湖，等十八區。人數最少，不滿二千的，是浙江處州，（一千九百七十三），湖南衡州，（一千七百二十四），廣西梧州，（一千六百八十九），雲南大理，（一千五百七十四），福建邵武，（一千五百六十六），山東威海。

衛，（一千三百二十五）廣東瓊州，（一千二百二十七）和吉林依蘭（一千二百二十七）。

傳教區中。外籍司鐸分配得最充足的是南京（九十）和兗州（六十九）華籍司鐸最多的是北平（一百零二）南京（七十四）重慶（五十一）杭州（五十一）和保定（五十一）。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一年中，新教友領洗最多的是南京（四萬一千四百六十二）獻縣（三萬七千二百九十二）兗州（二萬五千六百零二）南昌（二萬零八百零四）香港（二萬零四百十）武昌（一萬七千七百五十六）和正定（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一）。比較信友們告解領主的勤惰，而知各教區中信友生活有最高標準的，是南京區。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的一年中，該區信友告解九九五、九七五次，領聖體三〇一一、五四三次。同年，獻縣區的比例：告解三八五、一一一次，領聖體一〇三九、〇三四次。北平：告解三五五、五八九次，領聖體七八〇、八三一次。兗州、濟甯、西灣子、三區，信衆告解次數，約在二十萬以上。除了南京和獻縣以外，信衆對於聖體聖事比較勤領的各教區，是澳門（八十萬次以上）北平（七十萬次以上）和濟甯（六十萬次以上）其他如西灣子、綏遠、香港、和兗州，都在五十萬次以上。

各教區中，教育最發達的，是南京、北平、香港、漢口、兗州和天津。北平區內，共有男子中學校十處，女子中學校十三處，計男生一千一百八十六名，女生七百九十六名。南京區內，共有男子中學校八處，女子中學校五處，計男生二千六百二十五名，女生九百五十五名。漢口區有男子高級小學校二十處，女子高級小學校十九處，計男生九百四十七名，女生九百名。高等小學校男生最多的，要算南京區（一千五百九十六）女生最多的，要算香港區（一千六百）男童初級小學校最多的，只有兗州和天津兩區，兗州二百五十三處，天津一百三十處。可是初小男生，南京區最多，有八千零七十三名，其次是兗州區，有四千五百十五名。肄業初級小學的女生人數，南京區有六千四百四十八，香港區有二千八百五十五。教理小學校，要算獻縣最多（一千零六十九）其次是兗州（七百十二）永年（五百二十二）和北平（五百十九）。讀經男生最多的是獻縣（六千三百二十五）其次北平（五千四百四十九）南京（四千九百四十六）和保定（四千六百二十）女生，獻縣（六千六百五十）北平（五千四百四十九）南京（四千九百六十三）和兗州（四千零二十三）。

天主教傳教區所以成爲一種有力量的組織，全是因爲他統一於羅馬的緣故。中國各處傳教

區的首領，像任何地方一樣，都統屬於羅馬教宗，受專管在異教國傳佈福音事宜的傳信部，和代表教宗的宗座專使管轄。這種有向心力的組織，便是非公教的人士，也曾屢屢稱揚。國際傳教區雜誌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註1)的正副編輯，論及這一層，曾寫着道：『在這個（天主教）教會中，正因着他是普及全世，却又統屬於一個元首之下，所以在各國都覺着有一種中心勢力。』接着他們援引目前環境，論及當今教宗道：『這一回，這中心勢力，便是當今教宗庇護十一世心中所有傳教的切願……現在這種切願，所有尋求出路，和在世界各處表露的方式……已足表明庇護十一世是一個偉大的領袖人物了……』

亞幾烈拉底樞機 (Card. Apchille Ratti) 於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登上了伯多祿寶座，做了教宗庇護十一世之後，他許多最先模範中的一件，便是要繼續他的前任教宗們，額我略十六世，庇護九世，良十三世，本篤十五世，先後於一八四五、一八四九、一八七〇、一八八六、和一九一八年，所有欲行而未竟的志願，就是在中國派遣教廷代表這件重大要事。他登極後，還不到六個月工夫，便於那年八月九日，建立了駐華宗座專使的職位。同年十一月八日，第一任駐華宗座專使德奧道西

亞府總主教，剛恆毅氏 (Mgr. Celso Costantini Archbishop of Theodosia) 到了香港。剛總主教就職後，便於一九二四年五月，在上海召集第一次中華全國公會議，各屬外籍主，都蒞會參與，計法籍十七人，意籍十八人，比籍五人，班籍五人，荷籍四人，德籍二人。那兩位最先的華籍宗座監牧，也來與會。這回公會議一致的趨向，就在從速建立一個尋常，自立的，本國教會（註二）。

一九二六年間，庇護十一世，降了一道重要的通諭，給中國各屬傳教區的首領，這道通諭很足以消泯一般人因着中國政治運動，而對於天主教發生種種誤解（註三）。不久，上海公會議所提倡的政策，就給人們一種明顯的表示，便是在那時候，剛總主教欣然親自率領着六位華籍司鐸，導引他們到羅馬伯多祿聖座跟前，由教宗庇護十一世祝聖了主教。這件事在近代，還是一種創舉。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庇護十一世又特發了一個動人的電訊，給「中國最尊崇的人民」，表示他對於青年的中華民國，所有的同情和善意（註四）。此後的幾年中，傳教區域，陸續移交給會內會外的華籍神職班管理，辦妥接收的，已有不少。新任華籍教長們都已次第就職。目下華籍教長們，共有二十位，管理十二個宗代區，七個宗監區，還有一位是廣州的幫主教。屬於他們管轄的信友們，差不多有

四十五萬，約佔全國天主教信衆五分之一。

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中華民國政府舉行孫總理奉安大典時，教廷專使剛總主教，也曾代表教宗前往參與。非天主教國的中國政府，依着待遇各國使節的隆重禮儀，招待教宗代表，在歷史上還是一種破天荒的創舉咧。

當着中國人民遭遇水旱兵荒，或是其他天災人禍，備受困苦艱難的時候，天主教信衆，每每慷慨解囊，踴躍捐輸。一九三一年華北水災，教宗庇護十一世，捐助了十萬「里耳」（合洋六萬零六百八十五元七角六分）。駐華宗座專使署，也募集了四萬二千九百十二元二角七分，賑濟災黎（註五）。南京區主教惠濟良（Mgr. A. Haouisse）司牧，也通告屬下信衆量力捐助（註六）。該區信友們都，慷慨輸將彙集新舊衣服三萬七千零三件，銀洋五萬零六百八十五元七角六分。匯送災區施散。不多幾月後，上海發生了「一二八」中日衝突，天主教屋宇有十處改做了軍事醫院，收容傷兵，在院療養的近二千人，佔全數三分之一；又收容了戰區難民約一萬二千人，飢寒的，給與衣食，傷病的，予以治療，至少上海的信友們，前往各處收容所慰問援助。他們戰爭劇烈時，會由雙方商妥暫

時休戰四小時，好讓戰區難民逃避。這事大抵也是天主教教士們向雙方努力斡旋的結果。這件事，依着上海非公教的領袖報紙說來，委實『是中日衝突中，最偉大的人道主義的義舉』（註七），而且還是『上海人所應自誇的，一種人道主義的努力』（註八）。

慣常，艱難是跟着勝利同來的。聖教會經過了這許多戰爭、政變、和共產主義的宣傳，當然是不能毫無傷損的。好幾處教堂、學校、住院、被焚燬了。最近幾年中，有幾省常常在混亂中，不曾稍止。天主教的聖堂和教士住院，屢被佔據，財物被掠一空。司鐸們，不論外籍國籍，往往被搶劫、毆辱、擊傷，或是被擄、殺害。我們向全國各傳教區首領多方探問，詳細調查之下，纔知道一九一二至一九三三年間，除了許多本國信友們屢屢遭難，艱苦備嘗，不暇記述外，天主教教士們，先後被共黨、土匪、和其他盜賊所戕殺的，竟多至五十人。被他們架擄勒贖的，至少有三百二十三人，被擄時期，少則數小時，多至三年多不等。雖則在我們的統計中，只算得一次，有幾個却被綁架過兩三次。在被擄期間身死的，有三人。一九三三年內，迄仍被擄未釋的教士，也有四人，其中的一個是於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被共黨擄去，至今還在他們手中。

下列五種表格，依着他們被擄，或是被害的（一）年份，（二）那時候所任的職位，（三）他們的國籍，（四）所屬的修會，和（五）當時所屬的傳教區域，分別製成，以供查攷：

第一表

年 份	被擄人數	被害人數	年 份	被擄人數	被害人數
一九二二	一	一	一九二三	一〇	二
一九二三	一	一	一九二四	一二	一
一九二四	四	二	一九二五	一〇	一
一九二五	一	一	一九二六	一九	四
一九二六	三	一	一九二七	三三	六
一九二七	一	一	一九二八	三〇	四
一九二八	二	一	一九二九	四三	八
一九二九	一	一	一九三〇	七六	六
一九三〇	四	一	一九三一	三六	八
一九三一	九	一	一九三二	一三	一

共計	一九二二	一一	一	一九三三	三二三	四	五〇	二
----	------	----	---	------	-----	---	----	---

第二表

職	位	被擄	人數	被害	人數
宗座代牧			六		二
宗座監牧			二		一
區長			二		—
修會長			五		—
司鐸			二二二		四三
修院生			二八		四
辦事修士			九		—
修女			五九		—
共計			三二三		五〇

第三表

國籍	被擄人數	被害人數	國籍	被擄人數	被害人數
美(註A)	二四	三	意	五二	六
澳大利	一	—	南斯拉夫	—	—
奧	一	—	高麗	—	—
比	二二	一〇	班	一六	三
加拿大	三	—	瑞士	七	—
華	一〇二	一八	共計	三二三	五〇
荷	七	—	(註A)內有斐利濱人二名 (註B)內有華人一名已入 英籍		
英(註B)	二	—			
法	三七	四			
德	四二	四			
愛爾蘭	五	二			

第四表

修會名稱	被擄人數	被害人數
奧斯定會	一	一
本篤會	一	一
聖心司鐸會	二	一
白冷外方傳教會	三	一
加諾削會	一二	一
聖方濟各特規會	一	一
聖言會	八	一
多敏我會	八	一
多敏我修女會	九	一
方濟各會	三四	一三
瑪利亞方濟各會	三	一
聖神忠僕會	六	一

聖家會		三	—
伊蘇登外方傳教會		四	—
耶穌會		一七	三
遣使會		一〇	—
瑪利諾多敏我修女會		四	—
瑪利諾外方傳教會		五	—
密良外方傳教會		一〇	—
嘉布遣會		二	—
巴黎外方傳教會		二一	—
巴爾瑪外方傳教會		五	—
苦難會		五	三
比布斯二心會		—	—
寶血修女會		四	—
獻堂會		五	—

十六 現下的組織工作和艱難

開倍克外方傳教會	二	二	—
慈幼會	二	—	—
救世主會	七	七	—
救世主修女會	七	—	—
聖母聖心會	一八	一八	四
會外神職班	八八	—	一六
聖高隆龐外方傳教會	七	—	二
味增爵仁愛會	五	五	—
孔萬仁愛會	五	—	—
共計	三二三	三二三	五〇

第五表

廈門	五	—	貴陽	二	—	汕頭	—	—
教區	被擄人數	被害人數	教區	被擄人數	被害人數	教區	被擄人數	被害人數

十六 現下的組織工作和艱難

興安	漢陽	漢口	漢中	瓊州	福州	重慶	盤屋	鄭州	烟台	常德	長沙	廣州	安慶
	七	三	二九		二	九	一	四	四	一	五	四	三
—		—		—		—							
邵武	蒲圻	南甯	甯夏	平涼	甯遠	南陽	南京	南昌	洛陽	潯安	老河口	南籠	蘭州
一四	一	一〇	七	二	六	七	一二	四	一	一	一五	二	一
—	—	—					三				四		
永州	永年	延吉	餘江	宛州	延安	蕪湖	武昌	衛輝	齊齊哈爾	太原	打箭爐	汀州	四平街
	—	—		一三		九	—	三	三			一四	二
—		—	二		—					二	—		

香港	一〇	—	辰州	一〇	三	雲南	一七	一
黃州	—	—	韶州	二	二			
宜昌	一〇	七	朔州	—	—			
熱河	—	—	西安	五	二			
贛州	四	—	信陽	三	—			
吉安	—	三	敘州	—	—			
吉林	二	—	西灣子	六	—			
江門	八	—	綏遠	一〇	五			
岳州	—	—	澳門	—	—			
共計	三二三	五〇						

假使我們注意到一三〇〇至一八〇〇年間，外籍教士，在中國境內或是附近地方被殺的有六十人（註九）。一八〇〇至一九一一年間，多至一百十二人（註十）——這還不計入生長中國的本籍司鐸們和修女們，他們的名字不幸大都湮沒不傳，歷史上無從查攷——那麼，我們便可以知

道公教信友們，爲了天主教會在中國所流的血是多了。

(註一)一九三二年七月，三六三頁。

(註二)參閱德禮賢 中國天主教第一次全國公會議決議案件彙錄，見上海出版，一九二九年中國教務年報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11-114, 114-115頁。

(註三) Acta Apostolicae Sedis, 1926, 306-307

(註四)參閱德禮賢「新中國和教廷」(Young China and the Holy See)見Chinese Recorder 一九二九年，上海

出版，三三至四二頁。又 Nunciata Summi Pontificis p. II, pp. XI ad Sineses 一九二九年，北平出版。

(註五)參閱 CCS 一九三二年，二六一至二六四頁，八一〇頁。

(註六)參閱 L'esercizio della Carità Cristiana nel Vicariato Apostolico di Nanchino 見 Il Pensiero

Missionario, 1932, pp. 217-224 又 Woodstock Letters 1932, pp. 460—463.

(註七)見 North China Herald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二二七頁。

(註八)見全上，二二九頁。

(註九)包士傑氏：「中國和日本的傳教區社」(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 一九二三年，五二一至五四〇頁；一九二五年，六一二至六一三頁。

(註十)聖母聖心會傳教錄 (Missions de Schent) 一九二四年，五六至六二頁。

十七 結論

一種非公教刊物國際傳教區雜誌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註1) 的編輯們，在將最近十年間（一九二二——一九三二）全世界天主教傳教事業留意審察之後，發表他們的意見如此：「從羅馬公教傳教事業任何方面的研究看來，一種對於非羅馬各教會的教訓是顯而易見的：就是在一個元首之下，合成一個團體，」得有「一種包羅和解決，許多小小不一致的統一，使教會全體，能計劃一種普及全世界的政策，用普及全世界的規模，和一條不分散的戰線來實施這種政策，這便是絕大的優點。」

這種情形，對於中國的天主教會，尤其是確切不移啦。她實在傳給中國人民一致的福音，就是真天主也是真人，耶穌的福音，是一種一致的基督的教訓，和一致的信友的生活。這粒微嫩的小籽種，播散在中華的土地上——誰也不知道確實，是在甚麼時候，可是一定很早就播下了——

——到了中古時代，經聖方濟各的弟子們，重新種過了一次，又給聖沙勿略的昆季們仔細再種過，世界各方接踵而來的千百傳教士們，用眼淚、汗、血、來一再灌溉之後，這粒小籽種，在中國泥土上，已有堅固的根蒂，在不遠的將來，便要滋長繁榮，長成一棵枝豐葉茂的大樹了。這棵大樹，根牢繫在那永世的羅馬，從那裏吸取着他所必需的膏汁，他的檉枝要漸漸伸張到這茫茫大陸最遠的四隅。天主教努力圖謀發展中國的教育，已有了許多貢獻，對於援助老弱，拯救病困，養育孤兒，和被遺棄的兒女們，更是殫思竭慮，不遺餘力。如果人手較多，經費充裕，又能享受更大的安慰，和更大的自由，那麼，中國天主教教會所有的成績，必然更要可觀咧。然而我們却期望着不久她就要做成這至一、至聖、聖公、從宗徒傳下的教會的，一個繁榮的肢體。她早晚要在中國做成一個中國的教會，這不是說她要和其他的公教世界分離，尤其不是和統一的中心羅馬分離，——這樣她完全要敗壞了——却是說她要像在法國是法國的，在意國是意國的一樣，在中國度着她自己的生活，所有自主教以下的神職人員，都由中國自己的兒子們擔任。但是第一，她該是至公的；在同一的信仰上是一致的，在領受同樣的聖事上，是一致的，在同樣服從那同一的最高威權，耶穌的代收——而且依着聖女

謝納加大利納熱情的話，還是世界上甘飴的耶穌——也是一致的。

(註一)一九三二年，三七九頁。

中國天主教大事錄

- 二五至二二〇年 西利亞教士二人來華。
- 三〇三至三〇五年 阿諾比五氏宣稱福音已傳到中國。
- 四一一年 祝聖天主教宗主教阿該烏斯，他也許是中國主教區的創建人。
- 六三五年 阿羅本和其他景教（聶斯多略派的天主教）教士們，從大秦國到陝西西安。
- 六三八年 陝西西安建立第一座景教寺院。
- 六三五至六三八年 第一部天主教書籍，移鼠迷詩訶經譯成華文。
- 六四二年 關於景教的論文一神論問世。
- 六九九年 佛教徒初次和景教教士們爲難。
- 七〇〇年 四川成都建立景教寺院。

七一三年 佛教徒第二次和景教教士們爲難。

七四五年 上諭此後景教寺院概稱大秦寺。

七八〇年 大秦僧景淨等着手繙譯景教經典。

七八一年二月四日 西安立景教碑。

七九四年 彌施訶名稱見於釋教經典。

八二四年 近湖北與國一帶有景教徒遺跡。

八四五年九月三十日 唐武宗頒佈毀滅宗教的詔諭。

八五二至八五八年 古籍中述及是時中國有主教區設立。

八七八年 回教、猶太教、景教和祆教僧徒十二萬人在廣府被屠殺。

九八〇年 據報稱中國的景教已歸消滅。

一〇〇〇至一二〇〇年 景教傳佈於亞洲的中部和東部非中國民族中。

一二二五年 掃馬誕生於剛巴里克或上都（今北平）

一二四五年 瑪爾谷 誕生於綏遠東勝。

一二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喬伐尼比亞諾 賈比內到蒙古的都城喀拉固倫。

一二四七年 賈比內 回到法國。

一二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安德肋龍汝模 自西潑魯斯起程到東方。

一二五一年 龍汝模 回到巴來斯定。

一二五三年四月十六日 奇耀謀 魯勃路克 奉使東行。

一二五五年 魯勃路克 回到西潑魯斯。

一二六二年 有關於景教的記述，始見於中國正式文書中。

一二六五年 尼各老 (Nicolo) 和 馬弗奧孛羅 (Matteo Polo) 到剛巴里克 或上都。

一二七五年 馬可孛羅 到剛巴里克。

一二七九至一二八一年 鎮江府路副達魯花赤馬薛里吉思 在鎮江附近興建也里可溫寺七所，在杭州一所。

- 一二八〇年 掃馬任總巡閱，瑪爾谷做了中國宗主教。
- 一二八一年十一月二日 瑪爾谷任聶派西方宗主教，改稱耶哈巴拉三世。
- 一二八八年 掃馬歸順羅馬。
- 一二八九年三月六日 元政府設崇福司。
- 一二九二年 馬可孛羅離華。
- 一二九四年 喬伐尼蒙高味諾到剛巴里克。七月(?)掃馬逝世。
- 一二九八年 馬可孛羅的世界遊記，刊行問世。第一座正宗天主教堂在剛巴里克落成。
- 一三〇四年五月十八日 耶哈巴拉三世歸順羅馬。
- 一三〇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剛巴里克設總主教署，蒙高味諾任剛巴里克總主教。六位方濟各會主教離歐來華。
- 一三一三年 剛巴里克總主教蒙高味諾祝聖禮成(?) 福建泉州主教區成立。
- 一三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耶哈巴拉三世逝世。

一三二二年 眞福和德理到泉州。

一三二五年 和德理到剛巴里克(?)

一三二八年 和德理離華。蒙高味諾逝世。

一三三〇年 和德理回到意大利。

一三三一年一月十四日 和德理逝世。

一三四二年 若望馬里諾利來華。

一三四五年 馬里諾利離華回歐。

一三六八年 元代滅亡。方濟各會傳教事業結束。

一五五二年十月六日 利瑪竇誕生於意國馬知拉打。聖方濟各沙勿略圖入中國未果。十二

月三日，聖沙勿略逝世。

一五五五年七月 耶穌會士梅吉歐農乃時巴來篤到上川島。是年八月至十一月間巴氏曾兩

次到廣州。

- 一五五六年 巴來篤於五月間第三次到廣州。多敏我會士茄斯巴克羅自留廣州一月。
- 一五五七年 澳門做了葡萄牙人的居留地。
- 一五六二年 耶穌會在澳門立住院。
- 一五六八年七月 澳門第一任主教賈南羅氏 (Mel. Corneiro S. J.) 氏到澳門。
- 一五七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澳門主教區成立。
- 一五七八年 耶穌會士范禮安到澳門，任印度及遠東各屬耶穌會會長。
- 一五七九年七月 羅明堅奉范禮安命到澳門。
- 一五八二年八月七日 利瑪竇奉范禮安召到澳門。
- 一五八三年五月至六月 中國人始創「天主」名稱。九月十日利瑪竇和羅明堅在廣東肇慶創立第一個傳教住院，行第一次非正式洗禮。
- 一五八四年 天主經、聖母經、信經和天主十誠，譯成華文。利瑪竇製坤輿萬國全圖。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初次行正式洗禮，付洗二人。是月二十九日羅明堅所著天主實錄出版。

一五八五年十月二十日 羅氏天主實錄印發一千冊。十一月二十日羅明堅和麥安東 (FAL-
meida) 離肇慶往浙江紹興。

一五八六年一月二十日 羅明堅和麥安東到浙江紹興。四月六日，羅氏在紹興付洗一人。

一五八八年 華修士鍾鳴仁黃明沙求入耶穌會。是年十一月二十日羅明堅回羅馬，擬請教宗與中國皇帝商派專使。

一五八九年八月十五日 利瑪竇由肇慶往韶州。八月二十五日廣東韶州第二傳教住院成立。

一五九一年一月至二月間 鍾黃兩修士入耶穌會，中國人入修會的，此爲最先。

一五九二年三月至四月 廣東南雄開教付洗。

一五九四年七月七日 耶穌會士郭居靜到韶州。

一五九五年四月十八日 利瑪竇由韶州到南京。是年五月三十一日，利氏到南京，但不能留居。

利氏棄僧服改儒服稱儒士。六月二十八日，利氏到江西南昌，建立第三傳教住院。十一月至十二月間，利氏作第一篇華文論文，交友論。

一五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南昌購置教士住院。

一五九七年 中國耶穌會成獨立省區，利瑪竇任第一任會長。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龍華民到

韶州。

一五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利瑪竇偕郭居靜、鍾鳴仁和游文輝離南昌晉京，九月七日到北京。

十一月五日利氏等以不准居京南返。

一五九九年二月六日 利瑪竇駐南京。五月二十四日南京購置教士住宅。

一六〇〇年 天主教信友達四百人。徐光啓和利瑪竇在南京相見。五月十八日利氏偕龐迪

我、鍾仁鳴、羅文輝由南京北上。七月二十三日利氏等在天津被馬堂留難。

一六〇一年一月八日 萬曆帝令利氏等來京。二十四日利氏到北京入覲。五月二十八日利

氏在京賃屋居住。

一六〇三年 徐光啓在南京領洗入教。(二月?)

一六〇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南昌近支宗室領洗入教。利氏在京著天主實義出版。

一六〇五年一月六日 南昌皇族三人領洗入教。是年三月二十五日瞿大素在南京受洗，洗名依納爵。七月二十五至三十一日間猶太人艾姓到北京，爲利氏述及河南開封挑筋教情形。

八月二十七日購置順天門內教士住宅。

一六〇六年一月六日 耶穌會會長范禮安在澳門逝世。三月三十一日第一華籍耶穌會士黃明沙逝世。

一六〇七年四月十日至十一日 耶穌會修士鄂本篤卒於甘肅肅州。

一六〇八年九月 郭居靜在上海開教。

一六〇九年九月八日 北京成立第一聖母會。

一六一〇年四月 李之藻領洗入教，由利瑪竇在北京付洗。是年五月十日，利氏在北京逝世。

一六一一年五月八日 浙江杭州開教。 耶穌會士奉命修中國曆法。

一六一三年二月 金尼各起程赴羅馬，爲國籍神職班及聖祭禮儀用華文兩事陳述緣由。

一六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教宗保祿五世頒佈節略，准將聖經譯成華文，行禮儀時得用華語，舉

祭時並可戴祭巾，

一六一六年 沈灌興起教難。

一六二二年 教難重興。

一六二三年 中國耶穌會 葡國副省區成立。

一六二五年三月 西安景教碑發掘出土。

一六二九年 耶穌會士擔任修正曆法。

一六三〇年 湯若望擔任修正曆法。

一六三一年 第一多敏我會士 郭琦司鐸 (Fr. Angelo Cocchi) 來華，駐福建。

一六三三年 第一方濟各會士 利司鐸來華。是年十一月八日徐光啓逝世。

一六三五年 教士們對於禮儀形式發生爭執，相持很久，不能解決，因將全案呈報羅馬核奪。

一六四二年 多敏我會士 毛拉萊 (J. B. Morales, O. P.) 到羅馬對禮儀案提異議。

一六四四年 清帝入關改元順治元年。

一六四五年九月十二日 毛拉萊意見書奉教宗批准。

一六四八年 明永曆太后馬太后、王皇后、太子慈烜等，領洗入教。

一六五〇年 湯若望建北京第一座天主（南）堂落成，清帝順治賜銀助建。耶穌會士衛匡國

（Martini）奉派往羅馬提呈禮儀爭執案意見書。

一六五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衛匡國意見書奉教宗批准。多敏我會士羅文藻在馬尼刺祝聖司

鐸，爲第一華籍司鐸。

一六五八年八月十七日 南京成立第一宗代區，又在中國東南及西南兩部設最先宗座管理

區。

一六五九年 教宗亞歷山七世准祝聖華人爲司鐸，祇須能誦辣丁文字。

一六六四年 楊光先與曆法大獄，發生劇烈教難。

一六六六年八月十五日 湯若望逝世。

一六六九年 毛拉萊和衛匡國對於禮儀案的意見，經二次批准。

- 一六七一年 第一華籍耶穌會司鐸，鄭瑪諾維信在羅馬祝聖。
- 一六七三——四年 多敏我會那伐萊德（Navarrete）到羅馬提呈禮儀爭執案意見書。
- 一六七六年 那伐萊德 Tractados Historicos 出版。
- 一六八〇年 奧斯定會士來華駐廣東。是時中國第一位宗座代牧陸主教（Pallu）駐在福建。
- 一六八三年 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初次來華駐福建。
- 一六八五年四月八日 羅文藻任第一華籍主教，在廣州祝聖。
- 一六八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耶穌會士南懷仁逝世。是年二月七日，法籍耶穌會士初次來華駐北京。八月一日羅文藻主教祝聖三位華籍耶穌會司鐸。
- 一六九〇年四月十日 北京南京兩處設主教區，和澳門分立。
- 一六九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羅文藻逝世。
- 一六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康熙頒准許自由傳教詔諭。
- 一六九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福建代牧閩當發表反對沿用禮儀書。

一六九六年十月十五日 添設八處宗代區。

一七〇〇年 中國天主教信友達三十萬人。是年十一月三十日，禮儀爭執案，奏呈康熙核奪。

一七〇三年十二月九日 禁城內建天主堂，（俗稱北堂）行正式開堂禮。

一七〇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羅瑪聖部駁斥中國禮儀。

一七〇五年十二月四日 教廷專使多羅嘉樂（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到

北京觀見康熙。

一七〇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專使多羅出京。

一七〇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多羅在南京宣佈教宗禁約。（一七〇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七一〇年六月八日 多羅晉陞樞機後，在澳門逝世。

一七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教宗格肋孟十一世爲禮儀案頒佈“*Ex illa die*”通牒。

一七二〇年九月二十六日 嘉樂（Charles Mezza-barba）以教宗欽名義到澳門。

一七二一年十一月四日 嘉樂宗主教頒佈禮儀案「准行八條」。

一七二三年 康熙逝世。

一七二三——二七年 皇族蘇努全家流放。

一七二四年一月十日 雍正帝下諭禁止傳習天主教。

一七三二年 意國奈泊爾斯開設聖家學院，培植華人司鐸。

一七四二年七月十一日 教宗本篤十四世頒佈“Ex quo Singulari”通牒重伸禮儀案禁令。

一七七三年 耶穌會被迫解散。

一七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中國奉行耶穌會解散命令。

一七八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遣使會士到北京代耶穌會士職務。

一八〇〇年 中國天主教信友人數爲二十萬。

一八〇七年 誓反教徒開始來華傳教。

一八一四年 耶穌會恢復。

一八四二年 「南京條約成立」耶穌會士回華，駐江南傳教。

- 一八四四年 簽訂中法條約，准人民自由奉天主教。
- 一八四七年 仁愛會修女們初次來華（駐澳門）。
- 一八四八年 沙德聖保祿女修會修女們初次來華（駐香港）。
- 一八五〇年 上海耶穌會士創辦徐匯公學。中國天主教信友人數三十二萬。
- 一八五五年 上海創立獻堂會。
- 一八五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北京南京兩屬改設宗代區。
- 一八五八年 吉林創立聖母聖心會。密良外方傳教會士們初次來華（駐香港）。
- 一八六〇年 訂立「北京條約」規定信教自由。加諾薩會修女們初次來華（駐香港）香港創立耶穌寶血會女修會。
- 一八六五年 聖母聖心會司鐸們初次來華傳教蒙古。
- 一八六七年 拯亡會修女們初次來華（駐上海）。
- 一八六九年 加爾默落（Carmel）聖衣會修女們初次來華（駐上海）。

- 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天津 天主教信友們被屠殺。 教學修女們初次來華（駐香港）
- 一八七二年 北京 創立若瑟女修會。
- 一八七五年 包底歐上智會 修女們初次來華（瀋陽）
- 一八七九年 奧斯定會士 回華（湖南）。 聖言會 司鐸們初次來華（兗州）
- 一八八〇年 湖北老河口 創立聖方濟 各第三修女會。 正定創立若瑟修女會。
- 一八八三年 西都 苦修會士們，初次來華（河北楊家坪）
- 一八八五年 羅馬聖伯多祿聖保祿修院 教士們初次來華（陝西漢中）
- 一八八六年 方濟 各聖母傳教會修女們初次來華（烟台）
- 一八八九年 多敏 我會修女們初次來華（福州）。 中國 諸位致命第一次列入真福品。
- 一八九二年 甯波 創立拯靈會 女修會。
- 一八九三年 聖母小昆仲會 修士們初次來華（上海）
- 一八九四年 熱河 創立聖母無染原罪 女修會。

一八九七年 吉安創立聖婦亞納女修會。

一八九八年 廣州創立聖母無原罪會。

一九〇〇年 中國天主教信友增至七十四萬一千五百六十二人。華北發生義和團之亂。

一九〇一年 永平創立聖母女修會。

一九〇二年 慈幼會司鐸們初次來華（澳門）。

一九〇三年 上海創辦震旦大學。南甯創立聖家女修會。

一九〇四年 巴爾瑪外方傳教會士們初次來華（河南）。安老會修女們初次來華（上海）。

中國廢科舉。

一九〇五年 宜昌創立方濟各第三聖嬰會。聖神忠僕會修女們初次來華（兗州）。

一九〇七年 信友增至一百零三萬八千人。南昌創立聖母善導女修會。

一九〇九年 加拿大始孕無玷會修女們初次來華（廣州）。

一九一〇年 埃及及方濟各會傳教修女們初次來華（湖北老河口）。兗州創立聖家女修會。

重慶創立耶穌聖心會。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 武昌起義。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

一九一三年 敘州創立聖道貞女會。瀋陽創立聖母聖心會。

一九一四年 杭州創立聖心女兒會。

一九一五年 貴陽創立聖心修女院。

一九一七年 伊蘇登司鐸們初次來華（貴陽）。漢口創立方濟各第三會訓蒙院。

一九一八年 瑪利諾外方傳教會司鐸們初次來華（廣東江門）。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教宗本篤十五世頒佈“*Maximum illud*”通牒。

一九二〇年 聖高隆龐外方傳教會士們初次來華（漢陽）。瑪利諾多敏我會外方傳教會修

女們初次來華（香港）。山林聖瑪利亞上智會修女們初次來華（河南開封）。南陽創立

聖母無原罪會。

- 一九二一年 信友人數計二百零五萬六千三百三十八。苦難會士們初次來華（湖南辰州）
- 一九二二年 聖心司鐸會（雲南大理），比布斯二心會（廣東瓊州），包勒杜瑪利亞若瑟女兒會（熱河），勒奴維爾天神母后會（貴陽），聖烏蘇拉羅馬聯合會（汕頭），聖若瑟小姊妹會（山西潞安）初次來華。西安耶穌聖心方濟各第三修女會和漢中善導會成立。是年八月九日教廷設立駐華宗座代表。天津創辦工商學院。十一月八日第一任宗座駐華代表總主教剛恆毅來華就職。
- 一九二三年 救世主會士們初次來華（福建邵武）。蒙弗拉篤進教久佑會修女們（韶州），魯文奧斯定會傳教修女們（甯夏），和南林勞來篤修女們（漢陽）初次來華。是年十二月十二日湖北蒲圻第一華籍宗座監牧奉委就職。
-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五日 河北安國第二華籍宗座監牧就職。是年五月十五，至六月十二日，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公會議。加拿大寶血會修女們初次來華（獻縣）。太原創立貞女傳信教授會。

一九二五年 北京美國本篤會士創立輔仁大學。開倍克外方傳教會士們（四平街）、司格包羅勃罽夫外方傳教會士們（處州）、印五傷司鐸會士們（易縣）、奧斯定第三會教學修女們（常德）、孔萬仁愛會修女們（辰州）和方濟各會服務醫院的修女們（濟南）初次來華。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教宗庇護十一世頒佈“*Rezum Ecclesiae*”通牒。是年六月十五日教宗又降了一道通牒，給中國各處傳教區主腦。本年來華的男修會有羅本（Lopham）本篤會士們（四川西山）、嘉布遣會士們（甘肅）、方濟各特規會士們，和白冷外方傳教會士們（齊齊哈爾）女修會有聖高隆龐會傳教修女們（漢陽）、美國畢資堡聖若瑟會修女們（辰州）、貝來聖母贖擄會傳教修女們（蕪湖）、加羅薩聖母會教學修女們（猷縣）、耶穌聖心會修女們（上海）、聖心會修女們（嘉興）和救世主會修女們（邵武）。甯夏創立聖女嬰孩耶穌德肋撒女修會。是年十月二十六日，教宗庇護十一世在羅馬親自祝聖六位華籍主教。

一九二七年 巴爾瑪烏蘇里拉聖心會修女們（蚌埠）和方濟各第三會仁愛會修女們（湖南永州）初次來華。廣東北海創立聖母會和無原罪會。

一九二八年 奧斯定重整會士們（河南歸德），贖世主會士們（河南駐馬店），奧迪爾本篤會士們（吉林延吉），奧斯定重整會修女們（歸德），和拉克勞司卒世朝拜方濟各會修女們（武昌）初次來華。安國創立聖若翰保第斯大小兄弟會。兗州創立傳信協助會。是年二月八日中華公教「教育聯合會」成立。八月一日教宗庇護十一世致電中華民族表示同情。

一九二九年 美國沃海窪州若瑟山仁愛會修女們（武昌），英琴波聖十字架修女們（齊齊哈爾），聖方濟各沙拉修女們（朔州）和奈繆聖母修女會修女們（武昌）初次來華。武昌創立聖若瑟善功會。漢中創立寶血會，烟台創立聖母傳教會。安國創立德來院。是年六月十二日飭各屬奉行一九二四年上海第一次全國公會議決各案。本年一年中傳教士被匪戕害的多至十一人。

一九三〇年 全國分作一百個教區。本年被擄教士多至七十七人，為從來所未有。美國本篤會修女們（北平），和嘉布遣會第三會聖家女修會修女們（平涼）初次來華。宣化創立主徒會。集甯創立獻堂修女會。

一九三一年 門斯德始孕無玷會修女們（濟南）和耶穌孝女會修女們（安慶）初次來華。
海門創立小德肋撒會。蘭州創立聖家女修會。

一九三二年 河北永年創立聖神修女會。獻縣創立聖母救亡會。

一九三三年 湖南衡州創立瑪利亞亞松大方濟各第三修女會。常德創立傳教員女會。善牧會修女們（上海）奧斯定常律會士們（西藏）和聖母心子會司鐸們（徽州）初次來華。是年六月十一日，教宗庇護十一世在羅馬第二次親自祝聖三位華籍主教。聖言會接管北平輔仁大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史教傳教主天國中

著賢禮德

路 南 河 海 上
五 雲 王 入 行 發

路 南 河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刷 印

埠 各 及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行 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HE CATHOLIC MISSION IN CHINA

BY PASCHAL M. D'ELIA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